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

主编 李文海 匡继先

大西北上空的阴霾

·勘分西北界约记 伊犁条约·

孙燕京 著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

主编 李文海 匡继先

大西北上空的阴霾

·勘分西北界约记 伊犁条约·

孙燕京 著

（京）新登字 156 号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

主编　李文海　匡继先

大西北上空的阴霾

·勘分西北界约记　伊犁条约·

孙燕京　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印刷者：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960 毫米　32 开
字　数：85 000
印　张：4.75 插页 2
版　次：199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2 000
书　号：ISBN7—300—01555—7/K·160
定　价：3.80 元

序　言

● 李文海

迄今为止，辑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与世界各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协定之类最为详备的，还得推王铁崖先生所编的三大册《中外旧约章汇编》。列入该书目录的，共计1182件，其中除最初7件订于17、18世纪外，其余均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所订立。这些约章的情形自然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内容涉及国家的许多重要主权，有的则只是某个具体问题的细节规定；有的属两国政府之间正式签订的，有的则只是同某些外国企业、公司等订立的章程、合同、凭照。但不管怎样，综观这些历史资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当时国际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处境，却是一目了然的。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些约章的性质，自然免不了也有人把它说成是“揭开了（西方）对华事务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与欧洲“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法律、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开端”一类的

话[1]，但毕竟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一般来说，包括持有各种不同政治态度的人们，大都肯定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这些条约不是以平等国家之间的谈判为基础的，所以说它们是不平等条约。”[2]

帝国主义强迫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曾经给予我国近代历史以何种影响，我们打算先引用一位业已作古的中国人和一位现在仍然健在的美国人的话，来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提供一点参考的素材：

漆树芬在 1926 年出版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名《帝国主义铁蹄下之中国》）一书中曾这样写：“比年以来，帝国主义与军阀之狼狈为奸，加重我内乱，掠夺我金钱，屠戮我民命，已成不可掩之事实。而为彼等最便于勾结，最利于进攻之工具，犹当数一部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根据不平等条约以达其压迫榨取之目的，军阀则靠此不平等条约以酿成此循环式之内乱，所以这一部不平等条约，实为我之酸心疾致命伤。”“由是观之，弱我中国者，资本帝国主义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产生之不平等条约也。资本帝国主义

---

① 参阅菲利浦·约瑟夫著、胡滨译：《列强对华外交》，第 3 页。

② 这类议论可以说俯拾皆是。这里引用的是们斯：《远东——东亚近代及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话。

实为蚕食我之封豕长蛇；不平等条约实为束缚我之桎梏陷阱。”

准备引用的另一段话出自一位至今仍活跃在政治舞台的美国政要前些年出版的一本书，其中写道：“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这一衰败的现实同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发生猛烈的冲突。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甚至就在不久以前，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还都比那伙蛮横的侵略者们富有和强大得多。事实上，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大滑坡只是近代的事。”“这些事实驳斥了西方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个停滞和颓废的帝国，而更加生机勃勃和更富进取精神的欧洲人可以随时欺侮它。”

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你特地要引用这么两位人物所说的这么两段话呢？

确实，这中间并非没有需要说一说的小小的原因。

前几年，有位先生在一本颇有点名气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批评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的口诛笔伐的感情渲泄上，这就大大淡化了我们研究的理性色彩。”另一位先生则认为，解放以来关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的谴责，是一种早就应该抛弃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使历

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按他看来，殖民主义对东方历史“起了一种革命的作用”，“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的现实良机”。对于如此高深的理论，浅薄如我辈者自然难以领会，那末，我们先听听第三者的议论。前面引用的两段话，虽然也颇有点对殖民主义“口诛笔伐”的味道，但就作者而言，前一位早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即已谢世，而且那本著作前面还颇有几位国民党元老为之作序；后一位本身就隶籍“西方”，那本书又是以预言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为其主旨的，无论如何，停留在“感情渲泄”而淡化了“理性色彩”、甚至导致批判的“天平倾斜”之类的训斥，是决然不会加到他们身上去的。

“感情”和“理性”的关系，本是史学理论中的一个老问题。历史研究应该客观，所谓客观，就是要尽量探求历史的真实，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描述历史。是不是一定要心如死灰、不带任何一点感情色彩，才能对历史进行客观的研究和理性的思考，倒怕也未必。因为不带任何感情这一点首先就难以做到。观察任何问题，也包括观察历史现象，总要有一个立足点和出发点，或者叫立场。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感情，谁也回避不了。譬如说吧，不满于甚至谴责“异族侵略者”的侵略行径，这自然是一种“感情”；但对殖民主义感恩戴德，认为它对被侵略国家的征服，不过是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文明和进步的普遍

福音，又何尝不是一种“感情”？这两种不同的“感情渲泄”，究竟哪一种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实在不是靠自我的标榜，而要经受历史实际的检验。

话扯得稍为远了点，现在再拉回来谈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的掠夺。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勒索的赔款即达2.3亿两白银，赔款总数加上分期付款的利息，相当于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日本国家四年半的财政收入。俄、英、美、日、德等11国通过《辛丑条约》，则勒索赔款4.5亿两白银。张之洞所办的汉阳铁厂，是洋务企业中创办经费最多的一个，建厂时共支出银580余万两；也就是说，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勒索的赔款，可以建设大约80个汉阳铁厂，较洋务派创办全部洋务企业时投入资金总和要多出好几倍。

这里还只是就不平等条约中对中国财富的掠夺一方面来说的。事实上，不平等条约是一条“屈辱的绳索”，从各个方面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捆绑得死死的，以便听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任意吸吮膏血，作践蹂躏。李育民同志在自己的论文中把不平等条约按内容归纳为如下六大类别：

（一）以租界制度和治外法权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侨民管理制度；

（二）以协定关税、协定内地通过税、内河航行通商制度、陆路边境免减税制度、苦力贸易、自由设厂制度、路矿借款担保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经济特权制度；

（三）以海关行政外籍税务司制度和海关兼常关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行政特权制度；

（四）以自由传教和控制中国文化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文化特权制度；

（五）以对中国实行军事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驻军制度；

（六）以在中国某一区域取得独占权益和领土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制度。[1]

不言而喻，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将这些理应拥有的主权拱手送给别人，任何一个侵略者也都不可能仅仅通过"友好交往"就把这些特权轻易攫取到手。事实上，在每一个较为重要的不平等条约订立之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曾动用兵舰大炮，通过血与火的残暴手段，用野蛮的军事侵略（当然必不可少的还要伴随着政治讹诈、经济施压之类的种种名堂）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正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国侵华军全权专使的额尔金在谈到"天津条约"时十分形象

---

① 见李育民同志于1990年8月提供给"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论略》。

地说的那样，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因此，在每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背后，几乎都蕴含着一个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血泪斑斑的悲惨故事。

如果我们说，了解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我想是不能算过份夸张的。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像蚊子吮血似的将坚船利炮的“尖刺”刺入近代中国的孱弱肌体，造成近代中国的“大出血”。这“血”流到了谁的身上，“失血”的中国人很清楚，吮血而肥者自然更明白。正是这损失惨重的“历史大出血”，才使得新中国的起步乃至今天的四化建设显得格外艰难。而某些依靠在一个多世纪中大量掠夺世界各国财富而发家的强国的统治者，却在那里一本正经地指责或嘲笑中国经济“落后”的种种罪过，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历史无法割断。历史也就不应该忘却。

这也就是我们编辑这一套“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的出发点。这一套书，打算选取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若干不平等条约，以一个或几个内容相近的条约写一本书，生动而形象地将条约签订前后的有关历史情况介绍给读者，一共准备出10册。每一册书既完整地反映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全部出齐后又可对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的状况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编辑这一套书的计划，最初是晓虎、仰东、孟超几位年轻人提出来的。他们希望我和继先同志也参予此事，并担负主编的责任。我略加思索，也就欣然从命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同这几位青年分别有过愉快合作的经验，相互之间都比较了解；而更重要的，是觉得这确是一件值得花些力气的颇有意义的工作，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理应把这看做是自己份内的事。其意义，我想江泽民同志在《浩然正气》的《代前言》中的一段话说得极为深刻：

"现在，有不少的年轻人，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过去饱经忧患的历史，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不了解，不熟悉，甚至有些年纪大的人也渐渐淡忘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必须向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加强国情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希望这一套书能在这方面也起一点小小的作用。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日于人民大学林园

目 录

一百多年前的西北边疆，是一片辽阔的沃土。那里牧草丰、牛羊壮、水产富饶。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像三把利剑，横卧于西疆丰饶的土地上。北起斋桑泊（现哈萨克斯坦境内），西至巴尔喀什湖（现哈萨克斯坦境内），与东南方向天山脚下的特穆尔图淖尔（现名伊塞克湖、吉尔吉斯境内），塔克拉玛干沙漠北路的博斯腾湖，穿成了一串翡翠色的项链，戴在西北沃土的胸襟上。这里有数不清的河流，说不完的物产，道不尽的矿藏。另外，还有一条举世闻名的路横贯西北宝地。从古城西安出发，经过多风少雨的河西走廊，向西出嘉峪关，然后穿过漫漫戈壁，走天山南麓过喀什，再越过葱岭（亦称帕米尔高原）就到了阿拉伯。中原内地的丝绸宝物就是经过这条路运往世界的。

中原自古通西域。在遥远的大汉，武帝刘彻派使臣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丝绸古道。此后汉武帝西征北伐，在这里建立了“使者校尉”修筑了汉长城的座座烽火台。它像矗立在西北边陲的卫士，护卫着中原，保证了队队商旅驼铃不断。盛唐时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负责管理西北边疆的地方行政。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巴尔喀什湖畔的碎叶镇。日后，他带着西北人骨子里的豪放、血液中的深情，走遍了祖国的青山秀水，写出了瑰玮绚烂的诗篇。到了清代，享有十全武功盛誉的乾隆皇帝出兵平叛了准噶尔贵族之间的

内乱，将西域划归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至此，西域成了祖国民族众多，地域辽阔，语言复杂，形势险要的边陲重镇。

那时候，清王朝疆域辽阔，海内升平。从东到西，自南往北，到处是田园牧歌，文恬武嬉。然而，当朝野上下还在起劲地歌颂列祖列宗拓疆平逆，十全武功的时候，当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都自我陶醉在“天朝上国”那甜蜜的梦想的时候，中国却步入了多事之秋。这正是：

西疆好地方，
草丰牛羊壮。
不料阴云起，
窥伺有豺狼。

1 西线多战事

19 世纪的世界，是不平静的世界。伴随着工业革命机器轰鸣的是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隆隆炮声。在西方世界，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是英国。至19 世纪中叶，它已经可以用机器生产机器，生产力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巨大的生产力生产出来的产品迫切地需要巨大的市场来消化，所以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向海外扩张的势头更猛，步伐更快。执政的自由党首相帕麦斯顿坚决主张把政府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海外扩张，而不去进行国内的民主改革。所以在他执政的岁月，英国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取得了控制土耳其和自由出入黑海的权利；英国镇压了印度民族大起义，牢牢控制了这块辽阔富饶的殖民地；英国先后发动了两次对华侵略的鸦片战争，取得了通商贸易，领事裁判、协定关税种种特权；英国在伊朗，在缅甸，在南非，在埃及，在埃塞俄比亚，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几乎在整个世界，到处都有它扩张的触角。英国人从海外殖民地掠来的巨额财富，引起了全世界资

产者的垂涎。他们群起效尤，纷纷赶到世界各地去争抢肥肉，他们知道，餐桌上的佳肴已经剩的不多了，如果再不动手的话，就轮不到自己也分一杯羹了。于是他们争先恐后，唯恐捞不到油水。

沙俄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早在 1861 年农奴制改革之前，他们奉行的就是一套向外侵略扩张的政策。一方面，他们想用海外扩张来转移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转嫁危机；另一方面，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俄国的资产阶级影响越来越大，他们苦于农奴制条件下国内市场的相对狭小，想仰仗着沙皇政府向外扩张而开拓海外市场。除了上述两方面动力之外，俄国人在 1848 年欧洲革命之后还戴上了“欧洲宪兵”的钢盔，这样他们向外扩张的欲望更无比的强烈。

由于俄罗斯是横跨欧亚的国家，它的扩张之手就同时向欧洲、亚洲两个方向出击。

1853 年至 1856 年，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了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沙俄的对手是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国，本来俄国人想大举南下土耳其，趁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控制欧洲的咽喉通道，这样就可以纵横黑海、南下地中海觊觎巴尔干。不料，这个野心被英、法两国所遏制，俄国人失败了，他们向欧洲扩张的势头被阻止了。

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沙俄国内民情不稳，整个封建农奴制岌岌可危。为了掌握主动权防止下层革命的发生，1861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

废除农奴制并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改革后的沙俄国力增强，扩张更具备了条件。这以后沙俄把扩张的矛头对准中亚，加入了列强在亚洲霸权的争夺战。

沙俄侵吞中亚及中国西北地区的野心由来已久。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沙俄的军事力量就不断朝中国巴尔喀什湖（现哈萨克斯坦境内）以东、以南广泛渗透。在这一带，他们又是武装强占，又是修建堡垒，大有长期驻扎的架式。对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清政府先后多次通过外交途径提出照会以示抗议，但是终因西北薄弱的防御能力而未能奏效。结果事实上默许了沙俄对这一地区的占领。

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沙俄西进受阻掉过头来向东南推进。这个时候，俄国人想的是先把巴尔喀什湖已占的地盘牢牢控制住，然后再向东南，也就是中国的吹河流域和特穆尔图淖尔湖地区挺进。吹河流域和特穆尔图淖尔，是中国西北疆少数民族柯尔克孜族世代聚集之地。它位于天山北麓，风光秀美、富庶丰饶。往南经图鲁噶尔特山口可以到达南疆的喀什噶尔，那里是一片绿洲。沙俄早就梦想着有一天把这块丰饶的土地纳入他们的版图。1856 年哥萨克的骑兵向东挺进，他们长趋直入，一直跑到特穆尔图淖尔湖畔，想在这里修筑他们的堡垒。可是，柯尔克孜人民拆毁了他们的堡垒，把他们轰出了自己的家园。沙俄政府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们又派来了地理考察队、科学考察队，在各种科学探险的招牌之下，侵略分子偷偷摸摸地四处收集资源、物产、地形等各方面情报，并绘制出各种地图。一个号称科学家的侵略分子谢苗诺夫搞到了情报以后跑回去向沙皇煽动说，如果占领了包括伊犁河（现哈萨克斯坦境内）、吹河流域和特穆尔图淖尔的中国领土，并在那里建立起强大的俄国人的势力，那么这一功业并不比在黑龙江流域所取得的成绩小，那时候，俄国的国界就会移到天山雪峰。俄国就会在中亚建立起不可摧毁的堡垒。

形势是严峻的。假如沙俄阴谋得逞，那么他们就连成了一条威胁中亚和中国西北的堡垒线。原来早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俄国就处心积虑经营对中亚三个汗国的包围。从1847年至1853年，他们在咸海以东浩罕国境内的锡尔河一带向东南方向修筑了一条长达500公里的“锡尔河碉堡线”，在这里他们筑堡屯兵，形成了对浩罕国的直接威胁。同时，他们又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向南一直通过我国的库克乌苏河上游、伊犁河下游一带修筑了另一条名为“新西伯利亚碉堡线”的筑堡工事。这两条碉堡线遥相呼应、呈钳形包围了哈萨克平原。如果能占领中国的吹河流域，就能把这两条堡垒线最后连通，到那时中亚三汗国将面临倾覆之灾。因此不论从哪个方面看，沙俄对中国西北的吹河流域、特穆尔图淖尔以及南疆的

喀什噶尔都志在必夺。

不过这时的计划尚停留在“科学考察”阶段，沙俄军队在中国当地军民的反抗下还不能公然施行占领。

19 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之后，沙俄鲸吞中国领土的步伐加快。他们两面出击，对中国实施双重压力。

第一个压力来自中国的东部战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趁英法以“修约”为借口对华施行军事打击所造成的压力，迫清政府与之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取中国东北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造成东北边疆的深刻危机，并以东部压西部。

原来，当沙俄绘制了中国西北边疆南部吹河流域、特穆尔图淖尔周围以及喀什噶尔的地形图的时候，他们发现这里的富庶和战略上的重要，于是想得到它的欲望愈益膨胀了。可是这里守备的清军虽属薄弱，而沙俄自己却没有完成最后的布署，加上此时最要紧的是先组织一个“考察团”去阿姆河流域（现乌兹别克境内）研究如何控制阿富汗和南下印度，从而造成与英国在中亚地区分庭抗礼之势。另外他们还想把希瓦、布哈拉等汗国组织在由俄国人控制的阿富汗联邦内，这样就能阻住英国人由印度北上的势头。在这些事尚未办完之前，沙俄对中国西北领土的最后鲸吞还为时尚早。然而这并不等于沙俄在中国就无所作为

了，他们把下手的地点选在了中国东北。正巧这个时候，有几家强盗沆瀣一气，正准备向中国发动军事进攻，迫使中国政府同意他们的侵略要求。沙俄立刻跑了过去，马上就加入了对华要挟的行列。沙俄政府任命了一个将军当首任驻华公使，这个人叫普提雅廷。他和那个时代所有与中国做政治或经济交易的人一样，专门乘着兵船来华，借着武力逞凶肆志，吓唬清政府。

普提雅廷一到天津，首先提出了要和中国政府谈判划定中俄边界问题。他拿出俄罗斯军人的粗鲁和傲慢，居高临下地对中国官员说，你们现在既遇内乱（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又遇外患（指英、法、美三国要求修约），趁早和俄国签订条约确定边界了事，否则的话“如使俄罗斯大邻国不和，至于为敌，则贵国诸多有碍”。他以为，背后的大兵船和这些充满火药味的话足以吓得中国政府俯首贴耳，立刻坐下来画押签字。没想到中国政府告诉他们，中俄边界绝大多数地段已在《尼布楚条约》中划清楚了。况且长期以来西至伊犁，东北至海都是中国固有疆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哪里又冒出了“可议之处”呢？就算少数地段未定，也只属于技术问题，要谈只有去边界和那里的黑龙江将军协商，不必进京。

看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普提雅廷并没有去找黑龙江将军，倒是跑到离黑龙江距离最远的香港去了。他到香港找到了英、法、美三国公使，

告诉他们说，除非向中国政府实施最大的压力，否则的话，同他们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英法强盗点火就着，他们马上向广州发动了进攻，接着又沿东南沿海北上直趋天津。

战争打起来了。

战乱之中最容易涌出趁火打劫、发不义之财的流氓。沙俄此刻就扮演着流氓的角色。

当四国兵船在天津大沽口外耀武扬威的时候，另一支俄国军队，由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带领已经悄悄地跑到了瑷珲城下。他们一边鸣枪示威，一边把黑龙江将军奕山逼到了谈判桌前，告诉他如果拒绝俄国政府提出的划界要求，那么俄国就要站到英法联军一边对华宣战，到那个时候，想划也得划，不想划也得划。

也可能中国内部的农民起义意外地帮了沙俄政府的忙。由于长江流域的对峙，使得东北本来就很单薄的守备力量更加单薄了。不但黑龙江、吉林两省的 2 万守军大部分被调往江南，连中俄边境重镇瑷珲城的守军也只剩下 1000 来人，而且装备极差。俄国人说："他们大部分拿着一根顶端涂黑了的杆子以表示是长矛，少数人持有火绳枪，绝大部分人肩上挂着弓和箭筒" 相比之下，穆拉维约夫的远征军更显得强有力了。看到了这一对比的奕山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可不愿意承担开辟第三战场的责任，于是他打报告给中国政府，告诉他们俄国人在这里彻夜开枪，大有北边要起

兵衅之兆。清政府着实吓慌了，难道农民起义的连天烽火，英法联军对天津城的威胁还不够伤脑筋的吗？于是，清政府赶紧同意奕山就地与俄国人谈判，而奕山得了令箭，自做主张，未征得政府同意就与俄国人签定条约，商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后来，奕山还为此得到了处分，但这已是后话了。1858 年（咸丰八年）5 月，《瑷珲条约》先于《天津条约》而出笼，一纸条约，割走了中国东北 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规定乌苏里江以东 40 万平方公里之地由中俄双方共管，（二年之后，“共管”二字又被取消，40 万平方公里再入俄手）至此，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以东的肥田沃土、原始森林、丰富矿藏以及库页岛这一大片被马克思称之为“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被恩格斯称作“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划归沙俄。

《瑷珲条约》墨迹未干，俄国人又开始施展阴谋。仅仅 15 天之后，还在天津口外为英法联军呐喊助威的那个精明狡诈的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又在大沽炮台陷落英法联军攻入天津城之时，抢在英、法、美三国之前，率先与赶来天津准备与列强议和谈判的中国代表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条约第九条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

至此，沙俄在东北撒下了第一张网，不仅所

获甚丰而且为日后的西北边疆危机埋下了种子。

网撒两面。当东北危机沉重之时，西北也不平静。

西北地区的另一个近邻浩罕，在沙俄之前也曾不断骚扰吞食我吹河流域，浩罕的那些带有游牧抢掠性质的军队经常窜入这一带，甚至还建筑了一些堡垒。俄国人一看有机可乘，他们迅速打起了“防御浩罕人”的旗帜，尾随浩罕人进入了吹河。1859年，也就是在中国东北窃走了大片领土之后，俄国人马上制订了连结“新西伯利亚碉堡线”和“锡尔河碉堡线”的计划。陆军部的一个叫齐麦尔曼的将军写了一份报告呈递给沙皇，告诉沙皇连结两条碉堡线之后就可以轻取浩罕，而“对浩罕的大规模远征，俄国贸易必将繁荣兴盛起来。正如英法经过对北京的远征之后贸易繁荣兴盛起来一样。”这条连结假想线长达500多公里，中国的吹河流域首当其冲，1859年之夏，一支沙俄侵略军出发了，他们先建立前哨堡垒，接着向东攻占了托克马克、皮什别克这些本来是浩罕人修筑的堡垒。

假想线不再假想。他们付诸实施了。这样，中国西北的吹河上游终于落入了侵略者的魔掌。

2 一个"阳谋"

并不是所有的野心和狂妄都是通过阴谋实现的，有时候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阳谋，是公开的骗取和欺诈，是明火执仗。

到1860年，沙俄已经在事实上占领了东北和西北的大片领土，剩下的就是设法搞出一份文件，把这些鲸吞蚕食而来的赃物合法化。所以从1860年以后，沙俄朝思暮想的就是赶紧和中国谈判划界。说也凑巧，俄国人想要机会，机会就真的来了。

《天津条约》草签之后，咸丰皇帝收到了条约的文本，因为条约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才能正式生效。对俄、英、美、法四国与派去天津和外国人谈判的桂良、花沙纳绞尽脑汁、磨破嘴皮讨论出来的，加在一起多达140多款（其中还不包括文件附加条款）的四本文件，咸丰看了又看，觉得最触目惊心的不是列强勒索战争赔款，不是列强要求割让土地（俄索东北，英要九龙司），不是低的不能再低的关税，而是公使驻京。咸丰告诉手

下，“该条约，以派员驻京……最为中国之害”。为此他耿耿于怀，坐卧不安。思前想后，他想出了拒约再战的主意。拒约再战并不是件容易事，咸丰没有别的招数可想，只有在各国公使进京的路线上做文章，1859年，当公使们取道进京的路线与清政府规定的路线发生冲突的时候，战火又燃起了，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咸丰一边高喊着要御驾亲征，一边把处理后事的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弟弟，一边仓皇出逃，跑到了远离战场的热河避暑山庄。结果，不光是签订了《天津条约》还批准了《北京条约》(中英、中法、中俄)。

本来，普提雅廷搞出《中俄天津条约》之后，拿回俄国一讨论，那些狂妄的俄罗斯扩张分子就不那么满意，他们觉得《天津条约》所得的利益还不够多，而且由于它“完全忽视了我们和中国之间有着漫长的陆上疆界”，所以必须要在条约之外再加上八条补充意见，这样才能捍卫俄国的“陆上利益”。这些补充意见的内容包括，提出在西北划界的具体办法，把《瑷珲条约》中关于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共管”的字样取消，使沙俄完全占有这片领土等等内容。到1859年换约之时他们把这八条意见带了来。后来当战火重新点燃，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列强气焰更为嚣张的时候，沙俄的八条意见也涨到了15条。这回俄国的驻华公使已经换上了武官伊格纳提耶夫。那年月，在华

当公使、领事之类的职务，军人比文职的比例似乎更多一些。伊格纳提耶夫把《中俄北京条约》（又叫《续增条约》）的草案拍到了桌子上，用近乎于喊话的方式告诉参加谈判的奕䜣，你们只有老老实实地画押签字，而且“一字不能更易”否则的话，“俄国可以严厉的惩罚你们，……对俄国来说，如果要在一万俄里长的中俄两国边界线上对你们任何一地发动一次不可抗御的打击，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再说，英法联军尚未撤离，万一你们不想痛快地答应俄国的要求的话，我们随时可以把他们再请回来，到那个时候，就不是在桌子旁边坐下来谈判的问题了。要挟是把刀架在清政府的脖梗子上说的，况且，圆明园的大火还未熄灭，从京城西北郊外不时地飘来股股焦糊味盈塞于京城的大街小巷。于是，没有人还能放言高论了。1860年（咸丰十年）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正式签字。

俄国人不仅满足了侵略欲望，他们还布署了一个“阳谋”。西北边疆日后的许多危机，都在这里预设了契机。

《北京条约》中，有关西北边界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第二条和第三条。

第二条这样说，关于西疆未定之界划界的标准，原则上是按山脉、河流这些自然标志划界；在没有这类自然标志的地方，则按中国“常驻卡伦”（哨所）为划界标志。所以以后划西疆边界时

就要自“沙宾达巴哈之界碑末处起，往西直到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按这句话，离边境数百公里远的二个中国内湖斋桑泊和特穆尔图淖尔变成了分界之地（当然，日后这些湖也不再是划界的标志了，而是全跑到了沙俄境内，反而离中国边境有数百公里之遥了）。就凭着《北京条约》的这一句话，西北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岌岌可危。而对这明显的抢掠，中国官员竟没有申辩的权力！

条文里还明确说要以“常驻卡伦”为界。什么是常驻卡伦呢？卡伦本系满语，意思是“更番候望之所”，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哨所的意思。中国在西疆所设的“卡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边防哨所。原来乾隆皇帝出兵准噶尔，平定了那里的叛乱之后，为了更好地管理西北事务，曾在这里设立了大量的“卡伦”，分别称做“移设卡伦”、“添撤卡伦”和“常驻卡伦”。除了常驻卡伦以外都是按季节、按形势临时设立、临时撤除的机构。它们的作用主要是镇守山川隘口交通要道，盘查过往的商旅行人，监督流放劳改犯人，拱卫城镇，保护官府设施。另外还负责区分游牧部落、隔离民族以防止发生民族之间的冲突。西北的卡伦同时还兼负着驿站的作用。由于这些性质，决定了它们主要设置在城镇附近，与边防、边界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它们距离边境就比较遥远了，近则上百里，远则千余里。因此我们的卡伦原先并

不是边防哨所。如果以卡伦为分界标志的话，中国会凭白无故地丢掉许多地盘。

在第二、第三条里，还有语词含混的特点。《北京条约》中说划界的原则是顺山的走向，水的流向，可是实际上当时在中俄边境上大多数山脉与河流的走向都是东西向的。而要确定的边界线是从北往南稍稍偏西一点。于是边境线和山脉河流走向几乎呈现十字形，这样，就根本不可能沿着山脉、河流走向划界了。真不知道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的划界原则是怎样规定的？又准备怎样实行？果然，后来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条约的原则根本无法遵守，既然无法遵守也就等于没有原则，而没有原则沙俄就可以逞凶肆志，为所欲为了。

这种语词上的含糊无例外地出现在所有的规定中。比如它说从沙宾达巴哈经斋桑泊、特穆尔图淖尔至浩罕边界。这里就未能点明在经过这两个湖区的时候，究竟是经过湖的哪一点上，是左岸还是右岸，是湖心还是边缘？要知道，这个湖至少宽上百里。拿特穆尔图淖尔来说，它的长度为180公里，而宽度则为50公里，面积阔达6200平方公里。而在条约中，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高山湖泊竟用“经过”两字一笔带过。这是疏忽吗？显然不是。这是明显的别有用心。果不其然，到了划界的时候，这两个大湖都毫不例外地并入了俄国的版图。

更为恶劣的，是俄国人利用文字布署“阳谋”。

谁都知道国际上双边条约至少有两种文本，也就是缔约的双方各持本国文字的文本。有时候为了防患未然，还会有第三种或更多的文本（比如1881年（光绪七年）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就有中、俄、法三种文本）。一般地说，在各种文本相互对译时要严格的措辞，两种语言的翻译决不能出现误差。可是在1860年，却没有哪个中国人知道条约的文本措辞那么重要，他们不知道如果对方存心想置你于死地的话，便不会信守任何道义的原则。所以1860年的《北京条约》，无论是中文文本还是俄文文本，全由俄国人一手操办。本来所有的条文对中国人来说就不允许讨论，不允许分辩，于是两个文本中究竟是怎么写的，日后会发生什么纠纷就只有天晓得了。

强盗是根本不讲信誉的，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道义原则。

俄国人拿出中文文本和俄文文本带着两个明显的差异。在有关以常驻卡伦为分界标志的条文中，中文本写的是“现在中国常驻卡伦”，而俄文本中却写的是“中国现有卡伦路线”；另外对西北边界线的走向，中文文本写做“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而俄文文本则写做“向西南到斋桑湖”。这里是译员的疏漏吗？不，这里预设好了的圈套和陷井，这是一个只要亲眼看一下就能知道的“阳

谋”!

不幸的是,中国人当时不能亲自去看一眼。在那个时代，满朝文武中竟没有一个人懂一点点外语。创设中国的第一所语言学校，那还是二年以后的事情。这时候从京师到通都大邑，书院山房里响彻云霄的诵读之声还是“之乎者也”、“子曰、诸子论”一类的老调，人们孜孜钻研的还是由2000年前古圣先贤传承下来的厚重精深的中国文化。谁也没有兴趣去读读外语，假如真有人去学那些“南蛮鴂舌之音”,会被人们视做自甘堕落，会为人们瞧不起的，所以当俄国人公开在文件里作弊的时候，坐在谈判桌前的中国官员们全都懵懂不觉。

本来就被动，到了用文件做原则解释文件的时候自然就更被动了。

日后,到了西北边疆举行划界谈判的时候,清政府终于发现了问题。新成立的主管洋务的总理衙门为此两次照会沙俄驻华公使巴留捷克，申明按卡伦划界完全是对“北京条约”第二条的曲解。中国方面认为应该把这一条理解为在具体划界时除了以山川等地理形势为天然标志以外，有时也可以参照“常驻卡伦之处”，而绝不能就把界标放在“中国常驻卡伦”。另外，《北京条约》中文本明明写的是“自沙宾达巴哈界牌末处起往西直到斋桑淖尔湖”，所以划界时应该本着“往西直到”这样一个原则。可是俄国人却坚持说，俄文原件

写的是“向西南斜行至斋桑淖尔湖”。别看就是把“直”改成了“南”，可是意思却全然大变，往西南一斜，就割走了相当大一块领土。当总理衙门把照会交给俄国人，要他们做出满意的解释时，可他们却沉默不语。总理衙门一看，交去的照会大有泥牛入海的架式，赶紧又抄了一份直接递给俄国外交大臣。此后反复催问，俄国驻华官员才说，有关沙宾达巴哈至斋桑泊这一段国界的走向，纯系翻译上的错误。俄文文本中所说的“向西南”之语，“实属与条约之正义相符”，原先谈判时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只不过译成中文时搞错了，错成“往西直至”了。错在关键的措辞上，这个错误找谁算账呢？俄国人说，俄文本才是原件，所以必须按俄文本去理解。至于另一处不同，也就是俄文本中的“现有卡伦路线”和中文本的“中国常驻卡伦”这个明显的不同，俄国人却不再吭声，他们不说应该按俄文文本理解，也不提中文本有翻译的错误，相反倒是抓住中文本中的“常驻”二字不放，因为若按常驻卡伦划界，俄国人又能占去许多便宜，因为所有的常驻卡伦都比卡伦更远离的国境。

对两种文本出现的不同解释，清政府虽然据理力争，可是什么作用也没起，因为对强盗来说没有借口还要制造借口，何况白纸黑字堂而皇之印着借口，他们能放过吗！

更不幸的是，俄国人不但随心所欲地解释文

件，而且随心所欲地利用文件侵吞中国领土。

弓弦已经绷紧，

子弹已经上膛，

掠夺中国领土的阴谋已紧锣密鼓地开始。

3 塔城会议得与失

祸根至少在《北京条约》里就种下了。

然而，鉴于内忧外患的深重，清政府既使知道也无力去挖掉祸根，只能听任它潜滋暗长。过了一年，沙俄政府的划界代表趾高气昂地“依约”来到塔尔巴哈台，与中国代表讨论划界事宜。本来在《北京条约》签署以后，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经和俄国驻华公使商定，有关西北边的划界谈判将在二年之后于塔城举行。可是没等约期到来，俄国人就迫不急待了。他们委派鄂木斯克军团司令部作业部主任，一名职业军人巴布科夫当划界的谈判代表，他一到塔城，要求马上按照地图划定边界方向。中方代表是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明谊倒是早就呆在了塔城，可是却对俄国忽然提前划界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所以明谊一边对巴布科夫的提前到来提出质疑，一边查看巴布科夫的身分。不知为什么，巴布科夫动身的时候竟忘记带上俄国代表的全权证书，于是明谊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谈判。

巴布科夫灰溜溜地走了，可是他此行却满有收获，因为他顺手牵羊地搞到了一大堆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地理各方面的情报。所以他回去之后，可以从容地研究情报，策划来年谈判的各种对策了。巴布科夫带这些情报跑到彼得堡，和那些欲行瓜分之策的沙俄扩张主义分子们一起研究布署。总头目亚历山大二世还亲自召见了被任命为俄方谈判全权委员的巴布科夫，奖励他一枚刻着亚历山大名字的宝石戒指，鼓励他继续为沙俄的对外扩张活动建功立业。沙俄外交部还给了巴布科夫一个关于划界原则的特别训令。训令比《北京条约》走的更远。它这样解释《北京条约》第二条，说要完全按中国现有的常驻卡伦当中俄之间的假想边界。这样便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夺走中国更多的领土了。因为中国的常驻卡伦一般都远离现有边界，有的距离边界竟达千里以上。

另外，原来在《北京条约》中说的以斋桑泊、特穆尔图淖尔为自然疆界的原则，到了训令中却变成了把这两个中国内湖以及附近区域全划到俄国境内，不但变成俄国的内湖，而且距离中国边界有数百里之遥。总之，训令的胃口远比《北京条约》大，这样沙俄侵略者的形象愈来愈接近饕餮了。

方案已经制出，下一步就是如何具体实施。1862 年一开春。沙俄就搬出了早在黑龙江北岸，乌苏里江东岸就使过的故伎。他们先派几支侵略

军，将他们想占领的地盘一一控制住，然后再在谈判桌上强迫画押。沙俄的武装部队从维尔内，从科帕尔，从科克佩克特等堡垒里钻了出来，像蝼蚁一样涌向中国西北疆的各个常驻卡伦。他们越过了伊犁河，窜到特穆尔图淖尔湖畔；他们涉过察林河，跑到格根河扎下营盘；他们渡过斋桑泊湖，像盐一样洒到了喀喇额尔齐斯河两岸……。这些队伍之后，还有一支沙俄总参谋部的军事地形的测绘人员跟了进来，他们对沙俄划定的假想国界进行了测量，做这个工作就是为了能在塔城谈判开始的时候，在中国代表面前摆上一个既成的“边界事实”。

临近谈判，他们的军队已经完成了部署，做好了准备，只等着划界承认了。

当沙俄军队忙着实现部署的时候，中方代表倒也没闲着，早就来到塔城的明谊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一起着手了解中俄边界情况讨论卡伦、湖泊山川的形势。他们发现，如果真按《北京条约》划界，中国方面的就会吃大亏。比如那个特穆尔图淖尔，就在伊犁左近，如果让出去，伊犁城（惠远）、宁远城就将面临着来自西南方向的威胁，至于斋桑泊，更是塔城北面的天然屏障，如果尽入俄国私囊，那么便成了西北两面尽失屏障的孤城。这样西北疆界就无稳固可言了。明谊明绪的预感是对的，可是《北京条约》早已是铁板钉钉，无转圜之地，加上清政府对 1859 年推翻

《天津条约》后所受的打击记忆犹新，哪里还敢再次背盟呢？况且好不容易才得到了外患的暂时停息，怎么可以再启衅端呢？再者说农民政权还在南京分庭抗礼，对《北京条约》所吃的亏，总理衙门只好忍气吞声，充其量也只能叫明谊、明绪两人想想办法，尽可能地向沙俄"剖辩"一番，力求挽回一些损失。

明谊、明绪的使命是艰巨的，他们的工作也做的不错，不仅依据地图研究了形势，而且还专门派了中方分界委员会分三路带着《伊犁回部图》、《新疆北路地界全图》前往边境进行实地查勘，以期掌握边界线上的实际情况。不料派出去的人马，全被扎下营盘的俄军拦截了，他们甚至连边界线都不曾望见便沿路折回。形势越来越严峻，谁都知道，人与狼之间并无道理可讲，人与强盗之间也不存在剖辩的余地。谈判尚未开始，明谊、明绪就已经明显地感到了压力。

预订的谈判时间终于到了。

巴布科夫来了，他不是空身而来的。随行的除一般工作人员外，另有马步兵三百人，大炮两门。这支军队就在塔城城垣边的巴克图卡伦外围驻扎下来，两门大炮赫然对着塔尔巴哈台，这不是赤裸裸的军事威慑吗？

那个时代来华谈判的各国外交官，都是乘着兵舰、带着快枪重炮，而且总是不由分说地把军事恫吓放在和平谈判的桌旁。早在1840年鸦片战

争中就领教了列强坚船利炮的清政府官员们，对这一手尤其受不了。受尽侮辱、危言恫吓还不算，动不动就拿武器来说话。当枪口对着你的脑袋或胸口的时候，那个“不”字是很难说出口的。所以那时的外交谈判被视作畏途，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干那个差事。明谊、明绪虽未明说自己的感觉，可是于近在咫尺大炮底下的谈判是不可能太从容的。

8月3日，谈判开始。

巴布科夫按预定计划，上来就提出了以中国常驻卡伦为中俄边界的要求，明谊当然拒绝了，他说，按常驻卡伦划界是对《北京条约》的歪曲。按“条约内载自沙宾达巴哈界碑末处起，至浩罕边界为界，袤延万里，其中仅有三处地名，系指大数而言（着重点系引者加）”，“何况条约内载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并无为界之语。”怎么突然冒出来以常驻卡伦为界的说法呢？现在我们讨论划界，理应是讨论从前未定之国界，而对固有之国界应该是不讨不论的。再说，这里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民族都是中国的属民，根本不可能拱手相让。明谊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拿出地图来，和衷共济，秉公商办。有分歧不要紧，有意见不要紧，关键是拿出诚意，划界工作一定能做好。

然而，沙俄态度一开始就是不讨不论，他们的意见丝毫不能变动，结果第一天的谈判，双方各持一端，各不相让，基点相差那么大，会谈的

前景十分黯淡。

8月6日，继续谈判。

过了三天，可是巴布科夫却没有一个字的松动。中方代表仍在努力地据理“剖辩”。俄国人拿出了一份画着红线的地图，非说红线就是未来的中俄边界线，至少是划分边界的依据。中国人拿出了一份画着黄线的地图，坚持说旧有的中俄边界当是新界的原始依据。二份地图往一起一摆，沙俄的所有野心便全在桌子上显露出来，因为在黄线与红线之间，明显地隔着一大片辽阔的领土。所有的眼睛都凝视着两份地图，目光差不多都凝集在红线、黄线之上了。急然之间巴布科夫跳了起来，高声喝道：“我们不能以你们之图为凭”，“若要如此，即可不议”。空气刹那之间仿佛冻结起来，形势急转直下。

不过，巴布科夫说的不议，并不是卷起铺盖回家，而是“带来兵队占据卡外之地，不由你们不给”。这些赤裸裸的恫吓已使谈判根本无法继续进行。

8月10日，继续谈判。

这次巴布科夫没来，而是换了一个叫扎哈罗夫的俄国人，这个家伙也是俄方的一个谈判代表，他到来之后不由分说，先对中国代表的代表身份产生了怀疑。他觉得明谊、明绪在全权证书上缺乏权威性。仿佛他是中国官员的上级领导，兼负着考察代表资格的责任。为了确认中国代表的资

格，一拖就是10天，于是从8月10日至24日，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被扎哈罗夫的纠缠耽误了，整个会谈的日程安排也被搅乱了。

8月24日，继续谈判。

谈判的气氛像盛夏的气候那样难测难料。这一天，俄国人研究出一个新方案，可以把它叫成沉默战略，就是一至会场，双方默然相视，相对而坐谁也不吭一声。一时间气氛显得紧张而又沉闷。对视了半个多小时，中国的明谊终于忍不住而先说话了——总不能一上午就这么白坐着呀！明谊缓缓地拿出了中国地图、档案和那些散发着沉香的线装古书，拿这些物证来否定俄国人的"常驻卡伦线"的说法。明谊刚用事实说明在常驻卡伦以西早有固定的疆界，并以碣石为证的时候，扎哈罗夫像上一次巴布科夫那样发火了，他像一只斗红了眼的鸡，梗着脖子涨红了脸大喊，那石碣、那国界是"你们伊犁将军私行偷立"的，"乃小人之行，我们不能为凭"。

由于俄方代表意欲构衅，这一天的谈判自然进行不下去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中俄双方又举行了多次谈判，可是谈判的内容却始终停留在以常驻卡伦为界还是不能以常驻卡伦为界这一分歧点上。

明谊和明绪真算得上是"不辱使命"，他们面对着对方的沉默、叫喊、拍桌子、瞪眼，既不萎缩也不退却，据理力争，把嘴都快说破了，可是

对那些一意孤行的俄国人却什么作用也没起。于是，当沙俄代表拿出预先划好了的国界草案，摆在桌子上时，当中国代表提出须请示上级才能答复时，那些蛮不讲理的俄国人非说这是中国方面故意“推缓日期”，他们声明将离塔城而去，终止谈判。明谊等人再三挽留，甚至低声下气地打听对方何时再来的时候，这两个家伙竟理都不理扬长而去。

中断谈判是另一种形式的恫吓与威胁，当俄国人昂然而去的时候，中国代表们陷入了难言的沮丧之中。剖辩吧，俄国人根本听不进一个字，而且稍一坚持他们就中断谈判，不剖辩吧，眼看着大片国土为之不保；示之以威吧，门口架着俄国人带来的黑幽幽的大炮，示之以弱吧，那群家伙本来就已经嚣张到极点。甚至连招呼也不打就离开了，临走还甩下了一句“将来议与不议，尚难预定。”这又是赤裸裸的威胁！

中断谈判以后，俄国新对策是以“打”逼“谈”。

本来，中方代表并未主动中断谈判，扎哈罗夫等人的气焰虽然嚣张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明谊他们为了顾全大局也甘愿忍辱负重。到俄方中断谈判的时候，中国代表仍然设法挽救僵局，先是再三挽留，希望能稍留数日以待总理衙门的复文，接着在俄国代表们昂然登舆的时候打听他们几时回转恢复谈判，最后在俄国人单方面中止谈判之

后又多次发去照会，呼吁重开谈判，早日复会。诚意真可谓至矣！可是，这一切努力全属徒劳，发出的照会像泥牛入海渺无消息。俄国人正要要以打逼谈的花招。

俄国人回国后，密切地注视着中国西北的形势，伺机再抓住一个机会，后来，机会果然又来了。

1862 年（同治元年），陕甘回民起义爆发了。陕甘地区西通新疆，东连中原内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正因为它是清政府管理新疆的门户，所以这里汹汹的回民起义，像野火一样很快地沿着河西走廊西燃，新疆明显地动荡了。人们常说，混水才能摸鱼，沙俄嗅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亚历山大二世指示准备出兵，他要求自己的军队"尽可能实际上占据符合俄国意图的全部国界线"，只有在"解决了全部国界问题"之后，才可以恢复塔城谈判。

俄国大规模出兵开始了。

1863 年（同治二年）3 月，俄军开始向我国境内纵深地区推进，原先在巴布科夫拿给明谊看的那幅画着红线的地图，这回派上了用场，俄军差不多把红线以西的地盘全占领了，当中国官员诘问之时，他们竟蛮横地说，你们常驻卡伦以外的地方全是我们的。于是他们成了这里的主人，他们拦截了中国巡查边境的部队；他们拆毁了中国官员所住的毡房，他们禁止中国牧民在这里行走住牧。

在斋桑泊，俄国人拼凑起一支“斋桑部队”，沿着湖岸地区向东推进，一下子就把整个斋桑泊地区窃为已有。巴布科夫后来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邻接斋桑湖的地方，一劳永逸地使中国人了解，斋桑湖也好，全部周围地方也好，从今以后都无例外地处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在特穆尔图淖尔，俄国人依葫芦画瓢，也搞出了一个“喀什噶尔部队”，到湖区周围寻找建碉堡的合适地点，任务当然是想把牧穆尔图淖尔以及湖以东的大片地区抢到他们手中。

在科布多地区，俄军侵入了以昌吉思台卡伦到尼迈拉虎卡伦、胡兰阿吉尔卡伦之间的大部地区，他们用武力驱逐中国的守卡官兵，强行拆毁卡伦所属的毡房、帐篷，抢走武器弹药，他们说从此以后这里就归俄国了，中国兵民一概不许到这里行走住牧。

在塔城附近，在伊犁附近，到处都有俄国军队的入侵行动。

形势危机。清政府总理衙门、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分别向俄国提出抗议，谴责这种公然的侵略行径。可是，抗议只限于口头，清政府被各路起义队伍困扰着。加上畏战的心理，既使是腾的出手也不敢以刀枪相向。在战争气氛笼罩之下，一种不安的情绪在清政府的决策者中蔓延着。于是，尽快结束边界谈判，确定中俄西北边界成了最高统治者们的共识。到了六月，朝廷发

出上谕认为“早结一日，即早免一日葛藤。若再稽滞迁延，恐将来又另生枝节。”人们担心假如不赶快谈判，这些狡诈的俄国鬼子会想出更多的坏主意，他们的野心、胃口、欲望就会更大。

中国人着急了，俄国人却不然。

6月下旬，清政府照会俄国外交部，要求他们赶快派人来塔城重开谈判。与此同时，清政府命令中方代表明谊赶赴塔城，坐等谈判的到来。可是，迟到一个多月以后，俄国才发来照会，声明重开谈判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中方必须接受俄国提出的国界草案，如果不接受那条俄国人画在地图上的红线，那么俄国人就不去塔城。接着，俄国人在照会中讨论起《北京条约》的两个文本来。他们说，汉文文本写着的“自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的字样，全系翻译之错。而俄文文本才是正确的“和约之原文”，所以划的原则只能参照俄文文本。照此推论俄文文本中的另一句即“沿中国现有卡伦线”，也应该是“正确的”，而中文文本的“常驻卡伦”就应看作翻译之错，同样改正，可是俄国人对这一句却缄默不语。而且他们在谈判中死死抓住中文文本中“常驻卡伦”一句不放，硬要按此分界，于是中文本反倒成了非依不可的证据。可见，在没有道理时候，强盗们就根本不去理会什么道理。俄文本有利就用俄文本；中文本有利，就用中文本。一到这时，条约并不是什么原则，利益才是

至上的原则。

为此，总理衙门的官员们痛心疾首，尽管他们知道强盗惯于胡搅蛮缠，可是他们仍在据理剖辩。针对沙俄的照会，总理衙门再次发去照会说，条约的 2 个文本都是你们一手搞出来的。当时中国为什么同意在《北京条约》上签字，就是因为看见中文文本所说的边界线是“往西直至”，如果那时候你们就写成了“往西南至”的话，我们就不会答应了。况且，条约已经签字 3 年有余，从来没有听你们说过翻译上有问题，为什么到了开始讨论的时候，突然冒出了“翻译错误”的问题呢？

道义上的胜利遏制不了侵略者丧心病狂。当总理衙门和俄国反复争辩文本中的两个“错误”的时候，沙俄对西北边境的侵略又升级了。

1863 年 9 月底，俄军炮击伊犁的博罗卡吉尔卡伦。边报传来，清政府着了慌，奕䜣觉得如果再不答应俄国人的条件，把谈判拖延下去的话，那么损失就会比现在还大。所以他请示了皇帝和两宫太后，准备接受俄国人划定的边界。奕䜣约见了沙俄的临时代办，告诉他清政府的这一新决定，同时要求沙俄政府撤军。这位临时代办拒绝做出任何撤军的书面保证，只是口头上答应请求本国政府考虑从边界上撤退军队。奕䜣以为，有了这个口头上的承诺，沙俄军队就会后撤回国，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谈判就会尽快举行了。

然而，这种想法显得过于幼稚和天真。

4 约成国士丧

中国政府答应降格以求，按照俄国人的“红线”划定边界的消息传到伊犁的时候，沙俄的军队实际上已经吃了败仗。他们在进犯伊犁的途中遭到了清军守卡官员的英勇狙击，不但击退了侵略者，还捉到了几名俄国俘虏。同时，伊犁人民也行动起来，拒绝向沙俄驻伊犁的领事馆和俄国人在西北地区的贸易圈供应生活用品。领事馆派出去的采购队伍遭到了老百姓石块的袭击。在这样的打击面前，俄国军队只好向后撤离了。伊犁受挫之后，那个原本是谈判代表的巴布科夫带部队，从北疆的喀喇额尔齐斯河撤回到俄国境内。这时的巴布科夫别提有多沮丧了。然而正当他灰心的时候，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美尔却给他一个振奋的消息，告诉他中国人已经接受了按俄国的意愿划分边界的条件，要他急往塔城，重开谈判。巴布科夫实在是喜出望外，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说：“在经受了使人如此疲惫和忐忑不安的等待之后，得到了这个可喜的消息，我所感到的满意心情是

难以描述的。”这回他们是吃了败仗却赢得了“胜利”，怎能不使他们喜出望外呢？

巴布科夫和扎哈罗夫兴高彩烈地赶到了塔城。

谈判再度开始。

这一次，俄国人以为情况会简单得多，什么圈子也不用兜，既不必再去解释《北京条约》的两个文本中的“错误”，也不必拿沉默半个小时之类的招术吓唬对方；甚至不必再三番五次地强调俄国军队如何不可战胜，而是直截了当地说这回谈判不讨不论，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签署和交换国界条约就可以了。再说他们个人的时间也宝贵得很，10 月 27 日之前是一定要离塔城回国的。其实，他们 10 月 9 日方才赶到塔城，这样他们给谈判留下的时间 20 天都不到。

一切都和上次不一样。因为所有的问题都简单的多了。不过，现实并不像俄国人想象的那样简单。

明谊并没有接到总理衙门降格以求的通知，他先接到的是巴布科夫和扎哈罗夫走到半路时先发来的照会，这个照会告诉明谊，不用举行什么讨论，只是签署和交换国界条约就行了，另外他们说只能在塔城呆很短的一段时间，这个照会把明谊弄糊涂了。他到塔城来的时候，清政府的想法是尽早重开谈判，免得节外生枝。另外，明谊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在谈判中挽回利益，而不是完

全照俄国人的意愿划界。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和奕䜣的新指示，明谊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当巴布科夫他们到来之后，明谊一边要求扎哈罗夫讲解条约，一边把他们的照会寄往总理衙门，听候新的指示。这一来一往，时间必须要拖长，可是巴布科夫们给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8天，而18天显然是不够的。

明谊着实为难了。没接到正式的训令，他怎么敢按照俄国人要求的去做？况且俄国人生性狡诈，假话往往比真话要多，所以明谊要求巴布科夫和扎哈罗夫稍宽数日，只要接到文件一切都好商量。不料俄国人断然拒绝了。他们在10月25日宣布停止谈判启程回国。这个日子离他们在照会里所限定的最后期限至少还差2天。

过了几天，也就是11月3日，明谊接到了指示，知道了清政府确实同意按俄国提出的方案定约，可是那两位俄国代表已经走了9天了。明谊害怕出事，赶紧向总理衙门请示，同时赶紧照会俄国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美尔，告诉他希望明年俄国派员前来商办换约。明谊真是克尽职守，他还想给总理衙门在时间上留下一些余地。因为他在新疆奉职多年，知道如果全按俄国人划定的“红线”来划国界的话，中国实在是吃亏太多。至少沿边的蒙古、哈萨克、布鲁特、索伦等各族群众的生计会大受妨碍。明谊建议总理衙门再和俄国临时代办协商一下，能不能把红线向西边挪一、

二百里，挽回哪怕只是一点点利益也好。明谊的苦心无疑是对的，可是他却受到了总理衙门的申斥。1864年初，明谊接到了一串谕旨，叫他按既定的决议办事，务“将分界事宜，径行断结，不再再行咨商各国事务衙门，以致往返稽延，俾该国借口，另生枝节。”果然，明谊又接到了杜加美尔的照会，说鉴于你们还想在划界问题上争论，而不照我们所说的条件去划定国界，那么俄国拒绝再派员来华。

明谊无路可走。一头告诉他不来了，另一头则告诉他用不着再请示，赶快签约了事。这下他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为了免生枝节，防止再发生变化，明谊只好央求俄国人，叫他们赶快来。

1864年（同治三年）上半年的几个月里，明谊所做的工作就是求俄国人快来塔城，“按照议单，妥商定议”。这个议单就是1863年8月巴布科夫所带的那个由俄国单方面起草的划界文件。可是几经照会，俄国人都不肯来。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美尔说，要我们去，就得保证谈判时不再出现“讨论”的局面，而是完全不折不扣地按俄国人所规定的界址，立约绘图，画押了事。而且马上就按着这条新界设立界碑。明谊本来还想争取到把议单中与《北京条约》不相吻合之处更正过来的权利，可是杜加美尔已经又以战争相威胁了。5月，俄军径直地开到了他们划定的国界之

处，蛮横地驻扎下来，并绑架了中国驻守在这里的官兵。

明谊的处境越来越险恶。

新疆已经响应了嘉峪关内陕甘回民起义。在库车，在喀喇沙尔，在乌鲁木齐，到处是星星点点造反的火种。在伊犁，俄国人的军队已经占据了伊犁西部的博罗胡吉尔卡伦，而且把他们的势力扩大到图尔根河。眼看着，西北的起义和外患就要蜕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动荡了。

明谊和明绪急了。8月11日，他们照会杜加美尔，告诉他"准照议单，约派使臣，速来换约。"同时还要求他们撤走在伊犁的军队。

这回俄国人答应来了，可是对撤军的要求他们却假装没有听见。驻扎在伊犁的俄国军队，为日后的西北疆危机又埋下了种子。

1864年（同治三年）9月14日，巴布科夫、扎哈罗夫第三次来到塔城。和第一次一样，他们不是空手来的，不同的是，带来的军队数量却是上次的一倍，600名全副武装的俄国军人，拖着大炮先期开到塔城城垣的巴克图卡伦，也就是上次驻扎过的那个地方。同样的，摆好的大炮炮口正对着塔城。这回的武力威慑比上回更有力量，因为早在往来数次的照会里，明谊他们就已经被逼入了绝境，更何况俄国人早已洞悉新疆动荡的局势。于是对中国的谈判代表来说压力就不仅仅来自城外那些黑幽幽的炮口。

9月21日，谈判第三次开始。

这回才实实在在是简单了。俄方代表说，只能照单换约，而且人随地归。也就是割走多少土地，就占走多少居住在这些土地的人口，不存在将土地上的人口内迁的问题。这一切中方都答应了，剩下的事就是在俄国人画的分界图上，依照俄文注写满文地名。这样，中国到底有多少地方归到了俄国版图便一目了然。

10月7日，《勘分西北界约记》签字。

狼至羔羊亡，约成国土丧。

斋桑泊丢了。

根据《勘分西北界约记》第一条和第二条，中国西北疆北部的阿穆哈河、阿勒坦河、哈屯河、察拉斯河、布克图尔玛河、那林河、爱古斯河、布昆河、阿布达尔莫多河、布古什河、稚尔河以及阿勒坦淖尔（湖）、斋桑泊（湖）、阿拉湖都划到了俄国境内。在这一大块土地上，原来在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范围内的乌梁海十佐领、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内的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两个旗以及在这片肥田沃土之上游牧定居的哈萨克部落都被俄国人吞并。原来远离边境至少三、四百里的斋桑泊一下子成了俄国的内湖，那么多的河流全都成了沙俄的内河。

巴尔喀什湖丢了。

1860年以前清朝的西北边界在中段部位是沿着爱古斯河和巴尔喀什湖西北岸划分的。这时

候的巴尔喀什湖还是中国的内湖。而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第二条却使中俄之间的边界线向东南方向推移了成百上千里，使爱古斯河和巴尔喀什湖都成了沙俄的地盘。这样，原来归伊犁将军管辖的哈萨克游牧部落被吞并了。

特穆尔图淖尔丢了。

特穆尔图淖尔是世界第一大高原湖泊。这里山青水秀，物产丰饶，它是清朝西北边疆吹河流城的一块宝地。可是根据《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第三条，不仅将穆尔图淖尔，而且勒布什河、库克乌苏河、伊犁河中下游、吹河、塔拉斯河、纳林河上游都归于俄国。那片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湖泊，一下子就从中国版图上消失。世世代代在这里游牧的柯尔克孜族部落和他们的家园一夜之间就属于沙皇俄国了。

原先戴在西北沃土之上的那串翡翠色的项链被粗暴地扯断了，四颗璀灿的明珠一下子就丢掉了三颗。

4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丢了！这块国土相当于今天的4个江苏省或者4个浙江省；相当于北欧的瑞典全部国土或者是德国加上奥地利的全部土地。在这块国土上至少有17条河流昼夜不息地流淌着。还有大大小小的5处湖泊，那里生息繁衍着数不清的鱼虾和鸟类。可是全丢了。

巴布科夫兴高彩烈，他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无比的“振奋”。他自已说：“由于按照中国

常驻卡伦划界，在吉尔吉斯草原东部有属于中国的广大幅员的土地划入我国领域之内”而且他们在条约里已经定死了，要在换约之后的240天之内，双方会齐代表前往实地勘查建立界碑。所以不出一年，这些地方就不只是在地图上而且在实际中永远地从中国版图之内消失。

然而，他们想的又过于乐观了。新疆的动乱把计划打破了。南疆、伊犁地区和塔尔巴哈台地区由于动乱和起义，已经不再受清政府的“控制”。预期的建界碑工作被迫中断。于是沙俄原定的计划被打乱，他们等了几年，不见情况好转，便向总理衙门发来了照会，告诉他们，沙俄已经不能再容忍在建立界碑之前继续让中国军队呆在旧卡伦里面了，中国人必须限期撤走而不管这里的新界碑确立与否。

为了不至于出现更坏的局面，清政府决定先在没乱的北疆地区建立界碑。然而，就是在建界的工作中，俄方代表仍在捣乱。他们处心积虑地想多占中国的领土，他们总想把界碑尽量地往中国一侧移动，致使建界工作时断时续不能顺利进行。以后的几年里，中俄双方为具体划界事宜先后签订了《中俄科布多界约》、《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和《塔尔巴哈台界约》，在第三个条约签订之前，建界工作又出了差子，沙俄代表不等中国的划界官员到来，竟独自跑到边界上勘测划定，等中国代表来的时候，界碑已经钉好，只等着中方

代表签字画押了。

中俄西北边界南疆地段，由于动荡而未能勘定。这就又给了俄国人一个机会。

《勘分西北界约记》和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一样，是通过强权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所不同的是它在沙俄扩张主义的野心，欲望和大棒之下攫取的利益更多。光是领土，就一下子割走了 44 万平方公里，那么这土地之上的山川、矿藏又有多少呢？

5 玉门西侧燃烽火

19 世纪 60～70 年代对清政府来说是灾难性的年代。在这些年月里，清政府称得上是焦头烂额。先是祸起江南，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没费什么力气就扫荡了江南半壁江山，还在南京建立了长达十几年的政权。这个事实说明了清政府在江南、特别是在西南地区统治的薄弱。接着，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火从沿海燃起，从广州烧到上海，从上海又烧到天津，最后一直烧毁了皇家心爱的园林才勉强止住了。然而喘息未定，陕西和甘肃的回民起义又掀起了蔽日遮天的尘烟。1866 年（同治五年），和太平天国有那么一点点联系的捻军入陕以后，回民起义更成添薪之火，愈烧愈旺。回民们在信仰上有统一的伊斯兰教，而且被大大小小的阿訇们的传经活动强化了，再加上一些贵族人士别有用心的煽动，回民起义队伍终于走上了有组织的造反之路。此后的十几年间，清政府四处受敌、四处出击，大有疲于奔命之态，好不容易才稳定了陕甘，可是由

陕甘而西播的火种，却在新疆引起了连锁反应，在那里形成了燎原之势。

1863 年 3 月，伊犁起义。5 月，奇台暴动。6 月，库车叛乱。7 月，英吉沙尔造反。……这时候，还只能算做星星点点。到了 1864 年，这种星星点点的起义就大有燎原之势了。在北疆，最大的一支队伍是由一个叫妥明的大阿訇率领的，他和驻守在乌鲁木齐的一个清军将官联合，一举攻下乌鲁木齐和库尔勒，还有吐鲁番。接着，北疆的许多城市被妥明控制了。这个妥明自立为清真王，以圣教相号召，建立政权和中央政府对峙。在南疆，叛乱的队伍互相争夺地盘，抢夺领导权。这时候更有早就逃到浩罕去了的大和卓的子孙后代乘机挑起“叶尔羌汗国”的旗帜，他们想趁着喀什噶尔地区混乱的局面重新掌握政权并恢复和卓的统治。和卓的后裔被一个来自浩罕的军人阿古柏利用了。这个阿古柏原是浩罕的职业军人，他不仅在军事上表现了聪明和干练，而且精通权术，特别是善于用宗教来支持和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这些特点都使得阿古柏更有权势，他率领的队伍在南疆的各支队伍中更有实力。随着阿古柏攻城掠地，四处征伐，归附他的人马越来越多，所占的地盘也越来越大。后来阿古柏“功高震主”终于引起了他拥戴的那个和卓后裔的恐慌。这位和卓深知自己的能力远比阿古柏逊色，所以他想了一个干掉阿古柏的计策。孰料，阿古柏早就有了

防备，不等和卓下手，他就抢先把小和卓软禁起来，关到了英吉沙尔，和权力断然分离了。后来，阿古柏又强迫小和卓去麦加做朝圣旅行，于是小和卓的势力被彻底驱逐出南疆。旧贵族王朝的复辟终成一枕黄粱。阿古柏排除了称汗的一切障碍，终于在1867年自立为巴达乌特汗，称自己为幸运之主。他确确实实地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立汗以后，阿古柏打算将自己的势力向北疆拓展，他越过天山攻下库尔勒，接着又拿下了喀喇沙尔、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妥明的队伍似乎不再受真主保佑了，他们被浩罕的安集延人打的落花流水（安集延是浩罕之地，阿古柏就是从那里来的）。妥明投降了。眼看着，阿古柏就要在北疆得手，从而控制全疆了。

风云突变。

一直窥伺着新疆动乱的沙皇俄国，乘乱冲过了中俄边界，一举攻占了伊犁。沙俄打碎了阿古柏的大汗国之梦，自己却做起了囊括中亚，并吞八荒之梦。原来，侵占伊犁，从而得到更多的中国领土，正是沙俄中亚扩张政策的组成部分。话要从头说起。

19世纪60年代以前，中亚地区有几个独立的汗国。它们是浩罕国，布哈拉国和希瓦国。浩罕与中国的西北接壤，南部的锡尔河是它与布哈拉的分界河。浩罕以塔什干绿洲为中心，塔什干是18—19世纪中亚地区的重要城市，中亚地区的

物资交流，商品转运差不多全要经过这里。浩罕国人口 300 多万，其中绝大数是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人。在俄国吞并之前浩罕已经发展起发达的手工业和转运贸易。在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是布哈拉国，布哈拉的中心是布哈拉城和撒马尔罕城。这里也是中亚地区过境贸易的货物集散地。布哈拉汗国比浩罕国略小，人口有 250 多万，其中多数是乌兹别克和塔吉克人。同浩罕一样，布哈拉的棉纺、丝纺手工业和转运贸易十分发达。沿布哈拉再往南，也就是在阿姆河两岸是希瓦汗国的地盘。它是三个汗国中最小的一个，它以希瓦绿洲为中心，在这里从事园艺和畜牧业的人特别多。希瓦国人口大约 80 多万，主要是土库曼和哈萨克人。这几个汗国类似的地方很多，虽然民族的组成不尽相同，但是风俗习惯都很类似。

不过，汗国形成的时间都不算长，加上大汗们经常为争夺地盘、牛羊和牧草而相互争战，因此相互消耗，国力都不太强大。同时在汗国之外，还有许多营牧生活的哈萨克人，四处游荡，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园，逐水草而游牧，这就更使得这个广大地区具有松散的性质。

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掉头东进最先跑到了这个辽阔的哈萨克平原。接着他们在这里修筑了锡尔河碉堡线和新西伯利亚碉堡线，以后再拿下中国西北的伊犁河下游，吹河流域，这两条碉堡线就会合拢。

当碉堡线合拢的时候，阔大的哈萨克平原尽入囊中。这条线南边的三个汗国一下子变得朝不保夕了。因为俄国把哈萨克平原占领之后，三个汗国尽失天然屏障。俄军随时可以越过夹在哈萨克与三汗国之间的两块沙漠而挥师南下。南边有三个汗国，再往南有阿富汗和被英国人牢牢控制着的印度。克里米亚的失败只是沙俄在欧洲与英法争霸中的暂时受挫，下一个回合该是英俄在中亚腹地的争夺了。英国占印度以后并没想止步，他们顺着喜玛拉雅山左路向帕米尔高原推进。于是英俄在中亚碰头了。一个俄国军官明白地说出了俄国人的想法。他告诉沙皇，“亚洲是留给我国商业和我国工业活动的唯一地盘，俄国必须占领阿姆河，沿阿姆河开辟航运，这即使不在实际上，那么也在政治上威胁大英帝国”陆军部的一群狂热的沙文主义分子觉得，干脆把中亚的汗国全拿下来，这样就可以经常地威胁着英国的东印度领地。后来，这些狂热的想法都化做了狂热的行动，到 1864 年，沙俄腾出了两只手（一只在高加索地区完成了最后的征服，另一只签订了《勘分西北界约记》，拿走了中国 4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后像铁钳一样卡住了中亚汗国。1865 年 6 月，塔什干沦陷。沙俄找到了一些甘愿出卖民族利益的胆小鬼，把浩罕拱手相让，使沙俄对浩罕的征服成了“自愿归顺”。1866 年，沙俄开始对布哈拉施行军事打击。但是布哈拉的反抗异常的顽强，一直

到1868年双方才协定将一部分土地划归俄国，而另一部分则受俄国的保护。到1869年，沙俄又对希瓦汗国形成了包围圈，只等着三面出击，一举拿下了。

正当中亚兵连祸结之时，中国新疆的阿古柏闹得正欢。阿古柏成势以后，曾经四处联络，既同俄国人讨论扩大双边贸易问题，又西联奥斯曼苏丹帝国，希望得到中亚以外的伊斯兰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同时他还和英国人挂上了钩，利用英国人想在英国势力与沙俄势力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的愿望，赢得了英国人的信任。看这活动的架式，阿古柏志向不小，他可不想像浩罕、布哈拉那样被俄国人征服。沙俄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抢先一步，先在伊犁伸进了一只脚，于是就等于在阿古柏想象中的"帝国"打入了一个楔子，使他的美梦变得不那么愉快了。

新疆成了沙俄、英国利益必得之地，也成了清王朝西北边疆一块动荡不安并随时会酿成大祸的火药库。

一个新的伊斯兰教的"独立国"，会不会在中亚地区有新的号召力，从而影响沙俄苦心经营起来的征服计划呢？一切都不得而知，可是一切都似乎是明显的。于是沙俄觉得时不我待，必须马上行动起来，趁着阿古柏的政权未稳固之时就主动出击，来它一个措手不及。

1870年7月，俄国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下

令武装部队向伊犁推进，并迅速占领了伊犁通往南疆的交通要道穆扎尔特山口。在伊犁称汗的“地方政权”艾拉汗向沙俄提出抗议，但沙俄无视这种抗议反而把推进的速度加快了。1871 年 5 月，沙俄向伊犁的苏丹政权提出要求，让苏丹在 7 天之内交出所谓“逃犯”，否则的话他们就要自己跑到伊犁去追击了。伊犁苏丹没有理会逃犯的问题，入侵的借口就这样人为地定了下来。7 天之后，俄军分二路进攻伊犁。

可是，进攻的速度并不像俄国人想像的那样“长驱直入”，他们一越过边境就遇到了伊犁人民英勇的抵抗。5 月 15 日，一支由一个步兵连，90 个哥萨克骑兵，2 门大炮组成的侵略军，从伊犁河北岸的博罗胡吉尔卡伦出动向东进犯，他们的目标是拿下马札尔。不料，伊犁人民破坏了水渠，使得这支俄军出师不利，刚一跨上中国的土地便断了水源，后来他们勉勉强强地攻进马札尔，可是一进来就遭到了更猛烈的攻击。俄国人终于呆不住了，他们只好焚烧了马札尔之后撤退，一直跑到早已废弃了的空城霍尔果斯。伊犁人民再次向霍尔果斯发动进攻，迫使在这里仅呆了 3 天的俄军再度西撤。就这样不断地受到打击，不断地向西撤，几天之后，他们终于被堵了回去，又跑回了博罗胡吉尔卡伦。

伊犁河南岸也有一支俄军打算从春济卡伦出发向克特门地区进攻，但是他们遭到了同样的命

运。当侵略军进入克特门山口的时候，伊犁军民正埋伏在高地上严阵以待，当俄国人一露头，战斗就打起来了。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战斗一直持续了5个小时。尽管俄国兵用大炮猛轰中国的阵地，尽管伊犁人民负出沉重的代价，可是却没让俄国侵略军得逞，俄国人终于撤退了。以后的几天，抵抗依然是顽强而有效的。

第一阶段，俄军失利。他们原以为自己有几百人的队伍，几门大炮和一批哥萨克骑兵就能毫不费力气拿下伊犁。可是，一个月过去了，北路，南路都同样没有任何进展。于是考夫曼只好重新纠集更大的兵力，扩大战争规模。

春济卡伦的兵力增加到两个步兵连，半个哥萨克教导连，再加上一个炮兵连。博罗胡吉尔卡伦的侵略军一举增加到2 000人，大炮也由2门加至10门，接着，他们又开始进攻了。战争进入第二阶段。英雄的伊犁人民在侵略者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从博罗胡吉尔卡伦到宁远距离只有100公里，可是敌人却用了50天才攻下来，而且他们几乎是每前进一步都遭到了伊犁军民殊死的抵抗，迫使他们负出高昂的代价。然而毕竟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抵抗终于失败。1871年（同治十年）7月1日，绥定沦陷；7月3日，惠宁沦陷；7月4日宁远沦陷，伊犁终于不保，落入了沙俄侵略者的手中。

伊犁是新疆的一块绿洲，一方宝地。根据

1762 年（乾隆二十七年）规定的伊犁将军以及参赞大臣所辖之地，它包括了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伊犁河流域和拜卡达姆以东的塔拉斯河、吹河、伊塞克湖流域这一大片疆域。这里伊犁河、特克斯河、巩乃斯河、喀什河连成了一片雨量丰足、物产富饶的绿色沃土，滋育着万顷牧场，养育着数不清的牛羊。在这块土地上，以伊犁城为中心，呈环状分布着绥定、广仁、惠宁、熙春、宁远、拱宸、瞻德、塔勒奇 8 座城，9 城相互拱卫，交相辉映，成了南疆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汉族、布鲁特族、厄鲁特族、锡伯族人民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对这块风水宝地，沙俄垂涎已久。自从签订了《勘分西北界约记》，霸占了中国西北 44 万平方公里领土之后，他们就把视野投向了伊犁，并绞尽脑汁寻找新的借口，想夺走伊犁。甚至在过了许多年之后，还有一个沙俄扩张分子不无遗憾地说："肥沃的伊犁地区是向东延伸的一个坚固堡垒，并入俄国是相当有利的，因为这样不但极有助于保卫我们的领地，而且还会使中国受到威胁"。

1871 年，他们的野心借着动荡的西北局势而实现了。拿下伊犁城后他们四处出击，加紧扩大他们的占领区。接近年底的时候，他们已经占据了包括伊犁河谷在内的 7 万平方公里的地盘。这还不够，沙俄侵略军又向北疆扩展。1872 年 5 月，沙俄稳定了脚跟之后又派出了 3 个连，带着大炮

向塔尔巴哈台将军所辖的塔城地区逼近。他们口口声声地说，塔城系伊犁兼辖之地，既然他们已经“代收”了伊犁，那么塔城自然也应该由沙俄“代管”。不过，俄国人的愿望在塔城人民的打击下未能实现。过了不久，俄国人又想出了新招，准备东取乌鲁木齐，这样北疆就会在俄国的实际控制之下了。这回派出的部队不再是明火执仗，而是偷偷摸摸地化了妆，佯装成西域丝绸古道上往来的商贾，赶着骆驼，摇着驼铃缓缓东来。不过，化了妆的军人还是露出了破绽，刚走进石河子就被人们识破而堵了回来。

南疆也是沙俄朝思暮想的宝地。在占领伊犁之前，他们经常派商邦或者考察队，跑到南疆的喀什噶尔凑热闹。自从阿古柏在喀什噶尔称汗以后，沙俄侵略分子来的更欢了，更毫不掩饰地与之勾结。1867年阿古柏同意俄国人在喀什噶尔开设俄国贸易站；1868年阿古柏派自己的亲侄子去塔什干，向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表示敬意；1870年考夫曼告诉阿古柏，你必须像浩罕和布哈拉一样臣服于俄国，否则的话，下场也会像浩罕和布哈拉一样受到俄国强有力的攻击。当沙俄占领伊犁之后，不知为什么不再提让阿古柏臣服俄国了，反而公开宣称支持喀什噶尔的阿古柏政权。显然，俄国人是想把阿古柏培养成一个听话的傀儡，只要俄国人一牵线，他就会按照俄国人的意志办事。这样，阿古柏实际上做了沙俄在中国南疆的代理

人。1872 年俄国派出使团，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还同阿古柏搞了一个通商条约让俄国在南疆取得不少贸易特权。这以后，阿古柏虽然没有正式投靠或者臣服沙俄，可是他们往来密切，勾结甚深。

在此之后，沙俄开始在伊犁实施殖民统治，这种统治是极其野蛮的。

占领军宣布要销毁一切武器及其生产设备。他们把城中的两个火药工厂焚毁，并下令收缴民间的一切刀矛弓箭，甚至连农具、菜刀都被当做武器收缴了。以后很多年间，伊犁百姓 4、5 家合用一把菜刀。

占领军宣布，不得对他们表现出丝毫的不满和反抗。他们把 3、4 千壮年男子集中起来，像关进集中营似地供俄国人劳役驱使。这还不够，为了禁止他们反抗，俄国人抓走了这些人的家属，押送到俄国做为人质扣押起来。占领军还把居住在伊犁地区的百姓迁离旧址，按不同的民族固定到不同的地区安家，分而治之。

占领区不让伊犁民众与内地人民以及清政府保持联系，他们限制、阻挠清政府的官员前往伊犁，也不让伊犁人民前往内地。一经查获马上就没收财物，烧毁信件甚至拷打关押。强占伊犁以后沙俄政府下令将伊犁划归沙俄的七河省管辖。于是七河省的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就给伊犁将军写信，说从今以后伊犁归我们管了，你们不得再前来照管，免得百姓徒生二心。如果中国官员有

公务前往，那也只能先向俄方提出照会，说明理由、前往的人数和逗留的日期，否则的话是不允许中国官员往伊犁办事的。

占领军在这里实行高税收的政策。沙俄政府像对待浩罕、布哈拉一样对伊犁人民施行“按灶科赋”的税收政策。不管穷富，只要安灶起火就要交税。所以俄国人控制了局势马上就着手编籍户口，以按照户口收税。据清代文献统计，沙俄每年从伊犁掠走的税银“不下数十万两”。摊在3万户居民头上，平均每户每年纳税10两以上。从伊犁逃出的牧民报告说：“自从受制俄人，横加赋敛，中户每年纳丁畜税银十数两，上户数十、百两，最下亦须数两。兵役、通事人等供应需要在外，日朘月削，劳扰不堪。”靠着对伊犁人民惨重的剥削，沙俄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不过俄国人在占领伊犁的10年中究竟拿走了多少税银是没有一个确切地统计数字的，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知道自1871年到1877年的7年之间，沙俄仅“按照科赋”一项就勒索了536 745卢布60戈比。至于向店铺商栈、大小磨坊、榨油房之类的小作坊榨取的营业税，维持军队费用的“地方金”其它名目的苛捐杂税更多的不可枚举，以至连俄国人自己都说伊犁是中亚“财政收入最多的部分之一。”

按理说，俄国既然“代收代管”伊犁，并且还在这里征税，那么同时也应该负责起灾荒难民

的赈济工作，至少从百姓身上榨去的油水，应该有一小部分用于这一地区包括赈灾在内的各项行政管理，可是占领军在伊犁却侵占了清朝的救济款。原来，清政府对发生灾荒变乱的地区要发放一定的赈济金。当伊犁沦陷时，清政府也曾调拨了赈济金用于扶助困苦无以为生的百姓。当中国官员带着银两前往发放时却受到俄国的无理阻拦，他们说这笔钱应由他们的七河省省长代为发放。中国官员不但不能亲往发放，而且连监督的权利都没有。后来，当中国地方官员寻问这笔钱去向的时候，沙俄官员搪塞说全寄到了图根河两岸的厄鲁特、索伦族人那里去了。可是当中国官员到这些地方查看民情的时候，看到的竟是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一群群无家可归的饥民，他们连钱的影子也没见到。就这样赈济金根本就没有寄给百姓，全叫侵略军贪污中饱了。

占领军还把伊犁变成了毒品产销地。强占伊犁之后，沙俄的七河省殖民当局马上鼓动伊犁百姓种植鸦片，当时的种植地主要集中在伊犁河谷到喀什河口一带，1874 年鸦片的种植面积曾经达到 7 650 英亩。生产出来的鸦片，一部分就地销售，使得当地人公开吸食鸦片，到处出售吸烟工具；另一部分输往内地，牟取暴利。当时的外国报纸披露说，仅 1874 年 1 年从伊犁输往中国其它地区的鸦片就价值 3.2 万多英镑。那么，俄国人统治伊犁长达 10 年，这笔肮脏的收入又该有多

少呢？

沙俄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他们明明想永久地占有伊犁，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们一赖就是10年，可是他们还假惺惺地告诉清政府，俄军对伊犁的占领只不过是暂时的，叫做“代为收复”。因为新疆动荡的局势直接“影响”了沙俄各方面的利益，所以他们不能坐视不问。因此，越过边界“收复”伊犁实在是一种对清政府友好的表示。他们会随时地归还伊犁的。话是这么说的，可是他们断定清政府根本无力平复新疆之乱，只要平定不了，沙俄自然就能永久地占有伊犁。

1871年（同治十年）8月28日，沙俄驻华公使向清政府宣布已经“代为收复”了伊犁，请清政府定出“如何办法”来。清政府得报后赶紧派了伊犁将军荣全赶赴伊犁，谋求会见沙俄的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交涉有关交还事宜。事不宜迟，荣全接到命令后马上从乌里雅苏台出发赶往伊犁。对清政府来说，对沙俄的狡诈领教的够多的了，万一延误了时机，日后恐怕不是光费些口舌就能收回的。

可是俄国一点诚意也没有。他们一看荣全要来伊犁，而且同时还派了一位代表前往阿拉木图（七河省中心）准备分头与俄国谈判，他们马上进行无理刁难。一会儿说要荣全去那丹木克，一会儿又说谈判改到谢尔基奥波利，反正是不准到伊

犁来。荣全无奈，只好去了谢尔基奥波利（现哈萨克斯坦境内）准备和俄国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谈判。然而当荣全赶到的时候，俄国的谈判代表却不知到哪里去了，甚至连踪影全都不见了。荣全肩负重任，心急火燎地等着，等着，一等就是 50 多天。后来好不容易才接到了一封来信，通知俄方谈判代表临时换了人。其实哪怕是换了 10 次代表也不至于用上 50 多天。新换的代表叫鲍戈斯拉夫斯基，这家伙一到会场屁股还未坐定就问荣全，你们派了多少部队（指平定新疆之乱的军队）？你们何时能够平定新疆之乱？你们要赈济伊犁百姓吗？如果赈济的话就把钱交给我好了．我会交给我们的七河省省长，他会代为发放的。反正你们是不能到伊犁去的。……鲍戈斯拉夫斯基还告诉荣全，俄国人要去科布多、布伦托海、哈密、巴里坤以及喀什噶尔这些地方通商，如果中国人能迅速地平定新疆之乱的话，那就会影响俄国的商业利益，而影响商业利益是不行的。鲍氏喋喋不休地说了半天，可是一句交还伊犁的话都没有。荣全实在觉得这家伙离题太远了，他忍不住提醒鲍戈斯拉夫斯基，这次谈判的主题只有一个，这就是如何交还伊犁，不知贵代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哪知这位沙俄谈判代表竟直截了当地说，伊犁问题我是一句都不能回答的。那么，你来干什么呢？

搞了半天，荣全看出了端倪，原来“逆探其

志，不止在要求重币，亦不仅窃踞伊犁，将尽新疆之地皆为己有而后已”。

问题严重，形势危急。

6 海防塞防之争

看来，俄国是想“尽得新疆之地”了。不过他们总是想把野心和真实面目掩藏的更深一些。虽然志在得伊犁，得乌鲁木齐，得全部新疆，可是刚刚签完了《勘分西北界约记》，一下子又挥师东进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俄国想出一个代为收复的借口，其先决条件就是清政府有能力收复新疆，俄国就交还伊犁，如果清政府没有这个能力，那么伊犁就属于俄国了。这个主意实在是妙，谁都知道如今的清王朝弱得不能再弱了，国库空虚，兵连祸结，哪儿还有能力再在新疆动武呢？如此说来，伊犁，乌鲁木齐甚至是全部新疆160万平方公里土地过不了多久就是俄国的了。等着吧！差不多每一个俄国扩张分子心里都是美滋滋的。

不过，事情并不是俄国想象的那么好，也不是表现出来的那么糟。当俄国人打下伊犁的时候，清政府实际上有一支部队在河西走廊偏东一点。俄国人并没想到，他们“代收”的理论和“交还”的诺言，实际上给了清政府一个机会。而且

清政府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早在阿古柏兴高采烈地在喀什噶尔称汗的时候，左宗棠的6万湘军就从中原开进了陕西和甘肃。从清政府的建制来看，甘肃辖有宁夏、青海和新疆，而且陕甘与新疆的广袤土地几乎是连在一起的，若想收复新疆，必先平复陕甘，所以清政府派左宗棠率领6万骁勇善战的湘军先在陕甘之地用兵了。这支湘军在江南战场和围剿捻军的战役中积累了不少经验，特别是攻城战。在陕甘，栅寨和城池恰好是回民起义的各支队伍持以自固的主要形式，而这两种形式又恰恰是湘军在江南战场上屡次遇到的，打起来当然就很有经验。况且左宗棠很注意西式武器的配备，用大炮和精良的后膛枪来攻城破寨是很容易得手的。所以清政府在陕甘围剿回民起义，虽然前后花费了7年时间，可是其中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做各种军需准备的，真正用兵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到1873年(同治十二年)，陕甘战争结束，用左宗棠的话来说，这一带先后平定不会再有关内外“勾结之患”了。

陕甘平定之后，清政府虽然没有形成明确的在新疆用兵的政策，但是左宗棠的6万装备的很好的湘军，却并没有马上撤回中原。而且左宗棠还派了手下的大将张曜先期进了哈密，在那里屯田储粮以备不时之需。

左宗棠在陕甘得手后，此刻正春风得意，他

期待着挥师西征，收复新疆，再建功勋。

但是，清政府还没有下决心，因为在清政府内部对西征收复新疆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

19 世纪 70 年代的边疆危机不仅仅来自西北，它还发生在东南沿海。说来话长。同沙俄等后起的资本帝国主义一样，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也走上了对内发展资本主义，对外疯狂扩张的道路。一般地说，扩张侵略总得有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而日本在寻找出兵的借口时是不管说得过去还是说不过去的。1871 年，54 名琉球水手海上遇险飘泊到中国的台湾岛，被台湾岛上的土著人抓来杀掉了。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又是一个与日本无关的悲剧。没想到日本就抓住了这个借口，在时隔三年之后，也就是在 1874 年 4 月，派出了一支由大隈重信率领的远征军攻打台湾。进攻的理由就是台湾人杀了日本的属民。一时间，东南沿海局势危急。

中国政府说，琉球自古就是中国的朝贡国。若说起琉球朝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372 年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仅有清一代琉球也虔诚得很，每隔 2 年就来朝贡一次，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间断过，怎么忽然之间变成了日本的属民了呢？退一步说，琉球和台湾之间发生的事，充其量也该在中国政府与琉球国王之间解决，日本国凭什么来兴师问罪呢？然而日本人却硬说他们有为琉球代言的权

利。原来，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南部的萨摩藩曾经背着中国征服了琉球，并将琉球一分为二，北部靠近日本地区由萨摩藩直接管辖，而南部则由琉球人自治。结果琉球就有了一仆二主的双重身份，一面继续当中国的藩属国而向中国朝廷纳贡，一面向日本的幕府，萨摩藩的藩主纳贡。而且当中国和琉球交往的时候，日本人也总是偷偷摸摸地躲在背后。直到1874年日本人说有权替琉球人说话时，中国人还蒙在鼓里。不管琉球的地位最终怎样确定，现实的问题是日本人已经打到了中国的台湾，东南沿海顿形吃紧。

面对同时发生在西北和东南的两个危机，清政府内部官员提出了不同的对策。

1874年末（同治十三年），李鸿章上一份奏折，从筹饷的角度谈到了西征的困难。他觉得值此西北、东南同处危机之时，更要紧的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搞好防务工作。李鸿章认为近代一系列战火都是从东南沿海烧起来的，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辽阔的海疆不再是中国的天然屏障了，来自海上的威胁已经明显地大于来自陆地上的威胁。1840年英国人从南海打到东海，1856年英法联军则从广州打到上海，又从上海打到天津，一直逼进北京；1874年日本在东边崛起，他们借琉球问题攻打台湾，以后谁能保证他们不再出兵台湾，出兵高丽呢！所以李鸿章的奏折开篇就说："历代备边多在

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麕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然有了变局，就应该有一套对付变局的办法，所以要大力发展海防。

在分析近代外患的起因时李鸿章说的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对东南沿海的防务，他更说得头头是道。可是一转入对西北边患的分析，李鸿章就陷于盲目和毫无眼光了。他坚决主张放弃塞防，其立论主要有三点。其一他觉得新疆这个地方“既无事时，岁需兵费尚 300 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加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所以留着新疆实在是使白花花的银子归于无用。其二李鸿章觉着现在的新疆，三面皆挨着强邻，西北有沙俄，再往西有奥斯曼、土耳其的帝国，西南方则有英属印度，其形势险恶的简直无以伦比，所以就是“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再者说，阿古柏自 1867 年在喀什噶尔称汗后，内引外联，“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早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不独伊犁久踞已也。揆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痡，尤虑别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广征博引之后，李鸿章提出第三个论点，以国力说明现有的力量是不能兼顾东南和西北两个

方面的，只有赶紧停止西征，把用于西征的那一大笔经费移过来补充海防之用，这样，东南沿海的防卫就可以巩固了。他比较了一下西北与东南对国家整体利益的影响，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而东南乱作，势必影响上响到清王朝的统治。所以他建议：“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

不知道李鸿章所说的现有边界划在哪里？是中俄 1864 年所订的西北界，还是阿古柏已经“独立”了的汗国与内地的分界？是沙俄占据了伊犁以后的边界，还是伊犁仍归中国的中俄边界？国土已不存，何界之有！

总之，照着李鸿章的意思，160 万平方公里的新疆之地是可要可不要最好不要的了。

李鸿章是搞了多年洋务的大员，又身膺重寄，他的情绪，他的思想常常影响着许多人。海防之议起，自然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他们普遍觉得，西征的饷需实在太大了。左宗棠的 6 万湘军已经在陕甘干了 7 年，每年摊派到各地的协饷已经高达 600 多万，而陕甘好歹还和内地各省挨得近点。再向西征，出河西走廊，出嘉峪关，那么路程少说又增加了一倍，粮草车马武器一应出自关内，那得要多少经费才能维持！尽管人们知道张曜已经在哈密兴修水利，开垦了 2 万亩荒地，可是靠屯田种出来的那点粮食是肯定支持不了 6 万张嘴的，更何况，仗一打起来，花销将会更大。所以

醇亲王奕譞也发表意见，他说，在所有的关于筹饷的议论中，“李鸿章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奕譞主要是以筹饷的角度赞冀同罢西征之议的。

但是比较起来持海防之议者还是少数。多数人觉得丢下新疆那一大片宝地弃之不顾实在说不过去。所以他们觉得塞防至少同海防一样重要。持塞防论的人中，左宗棠自然是前锋线上的人物。左帅在陕甘转战7年，对西北的军务熟悉许多，而且颇有感情，再加上他现在仍有6万精兵在手，轻言放弃新疆在他看来简直不可想象。李鸿章奏折递上去以后，左宗棠也向朝廷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说，只要“使俄人不得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至构衅于东南”。何以见得呢？左宗棠认为，中国向任何一国示弱，都会遭到所有列强的看不起，那时候他们就都会来欺侮你。所以这时不但不能停兵节饷，反而更应“全力注重西征”，否则“则我退寸而寇进尺”，“我师日迟，俄人日进”。只有巩固了塞防，海防才可以巩固，没有塞防，也就没有海防。

大理寺少卿王家璧非常同意左宗棠的意见，他还谴责了李鸿章，说他“又议割新疆于回酋，变科目以洋学，及用洋人开矿掘煤等事”，真是“危言耸听”。王家璧的支持并不错，可是他对李鸿章所办的其它洋务活动一并加以反对，这就大错特错了，成了死守祖宗之法的顽固分子。不过在那时，凡是守旧的人物大多数不同意放弃新疆，保

守的思想和爱国的精神在这里显出了不那么协调的一致。

不同于别人放言高论，左宗棠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战略眼光的，所以他主张塞防的同时，还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具体步骤。这就是“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清朝称新疆北部为准部，新疆南部为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待“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对清政府来说，左宗棠的决心无疑是促使朝廷下最后决心的关键。同时，清政府对收复新疆还有更多的考虑。要知道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它对前明失国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发展注意的太少了。所以满族坐稳江山之后，一直非常注意对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搞怀柔、羁縻的政策。陕甘之乱影响了新疆，而新疆之乱或迟或早还会影响内地、影响周边。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新疆之乱，蒙古已经表现出不稳定的因素，不少武装起来的蒙古股匪已经开始以陕甘、新疆人为榜样闹了起来。如果不尽快把新疆局势平定下来，那么谁能保证蒙古不出大乱子呢？当然对清政府来说，它之所以下决心向西域进兵，还主要因为台湾危机由于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的签订而初步解决，这样它就能腾出手来，专门对付西北危机了。假如台湾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清政府无论如何也无能力解决

二场危机的巨额财政支出。海防塞防之争到高潮的时候，搞洋务有着同样资历的文祥说了话，成了举足轻重的意见。文祥在朝廷的辩论会上说："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疆大，无论破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驶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徒，则京师之肩背坏。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何以御之？"

文祥的意见颇具战略眼光，说服力很强。经过了反复论证之后，西征的重大决策终于确定下来了。

海防、塞防之争终于有了结局，由于大多数人的支持，罢塞饷固海防的议论没了市场。

1875 年（光绪元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受命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 年（光绪二年），6 万征西大军浩浩荡荡出发了。

这时候，沙俄正作着清政府无暇西顾的好梦。

西进的马蹄声惊醒了俄国人的好梦。听说左宗棠将率大军来新疆，沙俄政府赶紧派人去兰州打探消息，打探消息的人照例举着"科学考察"的旗帜。这回考察队的头子是索思诺夫斯基，名义是"科学贸易考察队"。这支队伍从北京出发，经天津、汉口、襄樊、安康、汉中，兜了一个大圈子才来到兰州。这时的兰州热闹非凡，左宗棠正秣马厉兵，调运粮草，搞得热火朝天。索思诺夫斯基在兰州呆了近 30 天，他会见了左宗棠，经过明查暗访，终于摸清了清政府派兵西征的消息是

确实的，而且他还看到左宗棠的军队气势正旺，粮草也十分充足。他相信在这支军队面前，阿古柏是肯定赢不了的。为此索思诺夫斯基写了调查报告，他在报告里说："这里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太不相称"，因此他向沙俄政府献策说，与其支持一个快要垮了的政权，不如转而帮助清政府，卖给他们粮草，试想想"假如7万武装良好，守纪律的，善战的，但由于缺粮而无法作战的军队，依靠我们的给养"，那么沙俄不就是争取了主动了吗？合作"就给粮食"，"不合作"就不给，清政府不就控制到我们手里了吗？到那个时候，他们还能再说不字吗！这些建议无疑是影响了沙俄的政府，日后左宗棠确实从俄国人手里买过粮食，这和索思诺夫斯基得出的结论不无关系。当然，在粮食问题上，清政府并没到了非依赖沙俄不可的地步。这一点，索思诺夫斯基又把自己估计得过高了。

征西大军由骁将刘锦棠率领，先向天山北路的白彦虎部发动进攻。战略意图就是先取乌鲁木齐。白彦虎原来是陕甘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一个首领，曾是马化龙的亲信。陕甘回民起义时他带着1万多善战能攻的回民控制着西宁。1872年（同治十一年）8月，刘锦棠攻西宁，硬是打了3个月才打下来。当时城中绝大多数回民战死，可是白彦虎却溜掉了。他一直跑到新疆，投靠了阿古柏。这回在乌鲁木齐及其周围的城镇，又是刘锦棠与

之对垒。同在西宁时一样，白彦虎终不是刘的对手，他又一次跑掉了。结果刘锦棠没费什么力气就拿下了乌鲁木齐。

刘锦棠攻乌鲁木齐的时候，阿古柏率军队正从喀什噶尔开到吐鲁番，准备接应乌鲁木齐的部队。可是他到的太晚了，不但未能解救乌鲁木齐的危局，而且派去的一支部队刚一上来就被击败了。本来，在清政府中流传着安集延人不好对付的神话，而且阿古柏来时"离喀城 2700 里之遥，狐火宵鸣，鼓角晓震，有气吞天南之概，"架式可端的不小，谁知真一交手，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左宗棠事后给朋友写信形容了阿古柏的军队，说"安夷火器颇精，洋枪洋炮外亦有开花炮。但不如官军之精利，又不善放，一败即不回头耳。"阿古柏的军队是靠着列强的扶持才强大起来的。这些精良的武器都是别人给的。1873 年土耳其政府"正式承认"阿古柏的汗国，不但册封了他"艾米尔"的称号，而且还送给他 3000 支来复枪，30 门大炮。英国人也对阿古柏的"国家"投入了相当大的热情，好些探险者越过葱岭跑来看阿古柏的汗国，还送来了几千支英属印度兵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滑膛枪。送来送去，到左宗棠入疆之前，阿古柏的队伍竟发展到 5～6 万人，而且每人手上都握着一支步枪。这些枪肯定给阿古柏好大的安慰，他真的以为靠着这些武器就能打败官军，就能坦然地在新疆称汗立国搞分裂。可他万万没想到，在

刘锦棠部队的坚决打击下，他那几万人手里的家伙并没起多大的作用，只是放上几枪之后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天山北路很快肃清了。虽然再往西还有一块地方被异族占领着，但是对这块地方是有言在先的，一旦平定了新疆之乱后，俄国就应该自动交出伊犁。所以刘锦棠的部队没有再往西走，而是折回了。

进入冬季，部队开始修整恢复体力。1877 年（光绪三年）一开春，刘锦棠部向天山南路迂回。这年冬天，阿古柏的日子很不好过，他吃了败仗后马上开始在达板城修筑碉堡。因为他知道，春天以后，官军肯定会先打达板城然后再南下进攻吐鲁番的。看样子，阿古柏下决心在达板城阻止官军的攻势。不幸的是，搞不清是阿古柏的碉堡不结实还是他的队伍没有士气，总之仅仅 4 天，刘锦棠就风卷残云般地把达板城拿下了。

与此同时，另一支由张曜率领的部队从哈密出发。与前来接应的刘锦棠部队共击吐鲁番。阿古柏的前景越来越不好了。更让阿古柏泄气的是，他的部队越来越多的人开了小差，还有不少人暗地与官军往来。眼看着军心涣散，胜利已没有多少指望。

左宗棠在新疆不仅会用兵，而且还善用计谋。他在新疆延用在陕甘用兵时就到处宣传的分化瓦解敌人、优待投诚者的政策。他反复地嘱咐张曜，

取南疆时一定要辅之以仁政，“安集延虏使其众，官军抚之以仁；安集延食取于民，官军矫之以宽大。”他对刘锦棠说，西征的主要敌人只有两个，一个是阿古柏，一个是白彦虎。其他都可以当成争取的对象。对这个打击极少数的政策，刘锦棠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他每攻克一城，马上就宣传优待俘虏的政策。与此同时，刘锦棠还注意保护难民的工作。每一次救出成千上万被裹胁西行的难民，刘锦棠都专门派出部队，护送他们回到故乡，“皆给以牛、种、赈粮，俾各安生业。”这个政策大得人心，很快产生了巨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叛乱分子悔过自新，同官军合作起来；越来越多的难民回到了原籍安居乐业，重建家园，新疆的局势迅速地稳定下来。

阿古柏支持不住了。1877年（光绪三年）4月26日，张曜率部入吐鲁番，刘锦棠率部入托克逊。阿古柏兵败退到库尔勒自杀了。剩下的叛乱分子做鸟兽散。不到半年，左宗棠的部队便四处出击，攻占一座又一座被残匪控制的城市。同年12月，拿下了南疆的总据点喀什噶尔，新疆全境克复。

对新疆的胜利，全世界都震惊了。西方人没有料到，中国居然还有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居然还能在极度衰弱之时夺取如此辉煌的胜利。后来有一位头脑冷静的西方分析家研究了阿古柏的失败，他认为：“中国人以欧洲人的武器和对西方的科学和技能的悉心研究，征服了喀什噶尔。他

们的士兵服从按普鲁士原则训练出来的教官的指导而行军，而他们的将军则根据毛奇和曼托伊费尔的学说来指挥他们的部队。即使用望远镜和双筒望远镜这样的小事情上，我们也发现这支中国军队是装备良好的。某些过分聪明的观察家描绘这支军队是由离奇的身穿绘有龙的军装或具有其他可怕外表的士兵组成，这是无比的荒唐可笑。凡此种种都是属于一种旧世界的理论。这支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于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它的惊人的胜利主要归因于中国在这一事例中彻底地融会了西方的见解。"其实他只说对了一部分，清军在新疆取胜的根本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它是正义之师。阿古柏除了是个阴谋家以外，他还是一个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他自立为汗搞国家分裂是不得人心的，自然也不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所以当左宗棠挥师入疆的时候，就能所向披靡，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欢迎。同时，他的军队的确也是一支武装良好，又善于征战的军队，这当然也是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疆收复以后还剩下两个坏蛋。一个是阿古柏的儿子，继承了汗位的胡里；另一个是屡屡逃脱的白彦虎。这两个家伙失去了南疆的最后几个城市后便向西逃窜，逃进了俄国境内。胡里又跑到了他老子的巢穴安集延，继续当流亡的伯克(汗)，而白彦虎则被俄国人收留在特穆尔图淖尔

湖边的托克马克。以后中国政府曾多次地要求引渡这两个罪犯，可是俄国都拒绝了，他们像收藏两个稀世珍宝一样，死死抱住他们不放，可能还想利用他们制造出新的机会！

清政府的出兵，以及清军闪电般地击溃所有阿古柏的军队和收复了阿古柏所盘踞的城市，实在出乎沙俄政府的预料。这时候再后悔当初说过的俟中国人收复新疆，他们便交还伊犁的诺言显然是来不及了。所以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决定派兵，而且 6 万大军真的出发了的时候，他们赶紧行动起来，企图趁阿古柏还未最后败亡之时，与他订立条约，从而在中国西北刮走更多的领土。即使是将来和清政府对簿公堂，这些也已经成了不可更改的事实，那时候不怕清政府不去咽下这些苦果。

1876 年 11 月，也就是刘锦棠部入疆以后，沙俄派了库罗巴特金使团跑到喀什噶尔，收集各种南疆的情报，接着又去了库尔勒，同住在那里的阿古柏讨论汗国与俄国之间的界线。当他到达库尔勒的时候，已经是 1877 年 1 月底了。这时，清军已经收复了乌鲁木齐，攻克了玛纳斯然后集结在天山北路冬训，只等着开春好天气以后向南疆挺进扫荡阿古柏政权。大军压境，阿古柏的日子正不好，恰好这时俄国人找上门来，阿古柏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在以后的几天时，阿古柏反复向库罗巴特金表示，他“唯一希望是保持

和土尔克斯坦总督的友谊。”另外，阿古柏还像奴才见了主人一样讨好地说：“只有依靠俄国人才能得到好处。”这些表白说得俄国人心里美滋滋地，这不正好是个敲诈的机会吗？他们本来就想趁阿古柏还活着的时候，从他身上多榨出点油水，日后可以同清政府讨价还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库罗巴特金当然就不用再客气了。他告诉阿古柏，俄国想要南疆与原来的浩罕、现在的费尔干省边境上的几个重要的哨所，而划界的条件则是以苏约克山口、乌鲁克恰提、玛里他巴尔一线划界，如果照这个条件办的话，阿古柏要吃很大的亏。可是此刻已容不得他在俄国人面前表现出半点犹豫了，更不用提什么民族、国家利益，阿古柏想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所以阿古柏同意了这条新的分界线。库罗巴特金完成使命以后得意洋洋地回国去了。幸亏南疆的民族分裂政权在这一年里就土崩瓦解了，那条由库罗巴特金和阿古柏达成的协议根本来不及实施就作了废。

3个多月的南疆之行，库罗巴特金的眼睛着实有点不够用。他除了负有划界的使命外，还兼顾收集情报的工作，还要顺便测绘出一条1300多俄里长的进疆路线。库罗巴特金还亲眼看到阿古柏的虚弱和他政权的不堪一击，于是他向俄国政府进言道，如果这时出兵南疆的话，阿古柏肯定能像“浩罕、布哈拉和希瓦的军队一样，能够轻而易举地被击溃。”真要是那样，别说那几个边

疆上的小小哨所了，就连整个南疆不全是我们的了吗！

可惜，这一切都来不及了。库罗巴特金前脚刚走，清军对南疆的最后攻势就开始了。刘锦棠和张曜的部队势如破竹，扇面似地扫荡了南疆残匪，达板城克复了，七克台克复了，辟展、吐鲁番、托克逊克复了。库尔勒、库东、阿克苏、喀什噶尔全克复了。所有被敌人占领的城市都克复了。战斗在这一年的12月彻底结束。

沙俄的如意算盘随着阿古柏政权的瓦解而破碎了。

新疆不期而复，同年，左宗棠上书请求新疆建省。

新疆的动乱终于结束了，那么伊犁呢？俄国人不是早就有言在先，假如中国政府平定了新疆之乱，那么他们就肯定交还伊犁吗！

7 “黑色”的里瓦几亚

清政府收还伊犁的努力并不是在平定新疆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沙俄攻占伊犁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前文已经说过清政府得报俄国强占伊犁之后马上派了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从乌里雅苏台赶往伊犁，谋求收还伊犁，可是沙俄派去谈判的代表却从始至终未谈伊犁的未来，只是询问了一大堆旁不相干的废话，第一次谈判就这样不了了之。

后来的交涉，都在总理衙门与俄国驻华使节之间进行。

得到荣全的报告后，总理衙门万分焦急。1872年（同治十一年）6月29日，恭亲王、总理衙门领班大臣奕䜣不顾王爷的面子，亲自跑到俄国驻华公使馆，向俄国人递交照会，要求他马上给俄方的谈判代表博戈斯拉夫斯基写信，要他尽快和前去的荣全协商解决交还伊犁的工作。奕䜣知道，沙俄强占伊犁绝不是什么善举，他们一定有别的目的，所以奕䜣特别关照了弗兰加里一句，只要

办好了交还工作，以后发展贸易发展商务往来都好商量。7 月 13 日，费兰加里给总理衙门复照进行了答复，说万一交还了伊犁，3、5 个月或者一年之内又“乱”起来了怎么办？难道还要再一次劳驾我们出兵帮忙吗？既然你们现在没有把握保证伊犁不再动乱，既然你们无力解决新疆的动荡，那么还是先不谈交收的事宜好了。他也特别关照了一句，想要伊犁的话，就得修改《勘分西北界约记》中的中俄西段边界。

看了俄国公使的复照，7 月 16 日奕䜣又一次前往俄国公使馆，再与弗兰加里磋商。弗兰加里坚持的仍然是中国能否守住不乱，能否保证俄国边境的安全？如果中国兵力不足的话，那么俄国人是很愿意代守的……，词语之间根本没有归还二字。不仅如此，弗兰加里还暗示，如果需要的话，他们还可以扩大代收代管的范围，比如南疆的喀什噶尔、玛纳斯等城。一听这个建议，奕䜣忙不迭地辞谢说，请你们免了吧，“好意”我们领了，可我们觉得这样会越帮越忙的。

这一次还是没有明确的结果。7 月 19 日，奕䜣第三次去了俄国公使馆，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

为这事，奕䜣简直是伤透了脑筋。8 月 2 日他把和俄国使节谈判的大致情形向朝廷做了汇报。他告诉皇帝、皇太后，前一阶段的谈判毫无进展，而俄国“所要挟各事端倪已露”，“察其隐衷，意在延宕。”他要求清政府早下克复新疆的决心，特

别是能否先行收复玛纳斯城，以堵沙俄狼子野心。

正当奕䜣焦急之时，博戈斯拉夫斯基突然于9月初来到北京，直接会见了奕䜣，谈来谈去，老调并没有一丝改变。好像不还伊犁完全是为中国着想似的。

1873年，沙俄驻华公使换上了布策（一译毕佐夫），他一来就通知总理衙门，让总理衙门转告荣全，以后不准他再去管伊犁的事了。因为那已是俄国官员职权范围的工作。而且布策说，塔尔巴哈台和库尔喀喇乌苏两城也归俄国军队管理了。

至此，不收复新疆就根本没有收还伊犁的希望。至少不收复乌鲁木齐和玛纳斯两城，是没有收还伊犁的希望。荣全看清了这一点。奕䜣和中国政府也看清了这一点。

然而当中国政府真的收复了乌鲁木齐和玛纳斯的时候，收复伊犁还是没有希望。克两城后总理衙门根据前任大使和去兰州考察过的索思诺夫斯基的许愿，再次与布策交涉，布策却说，中国必须先将通商交涉事宜办完了再说收还伊犁的事。后来，在北京的交涉又挪到了哈密，由移节到此的左宗棠同俄国七河省长官交涉交还的问题。

到此，已八度春秋，伊犁还牢牢地控制在俄国人手里。交还的问题像皮球一样被俄国踢来踢去，赖着不还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了。

弱国受欺侮，弱国无外交。

清政府本来是很想在伊犁问题上有所作为的，但是这个愿望终于被沙俄越来越大的野心和赖着不走的事实所打破。与七河省省长，与驻华使节之间的交涉历时数年，往来无数次，可是终不得要领。看样子非得派一个高级代表团，去俄国首都彼得堡说话了。

1878 年（光绪四）年 7 月 21 日，清政府任命三口通商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盛京将军崇厚为出使俄国头等钦差大臣、率头等参赞邵友濂以及随行人员 30 人前往彼得堡，办理交还伊犁事务。

在清政府看来，崇厚是一个去彼得堡的最合适的人选。虽然汉族官员在克复新疆的过程中功德无量，可是绝不能再叫收回伊犁的荣耀落到他们头上了，因为这样很可能增长他们的几分骄气。再说，同一年派出去的几位驻外大使，比如驻英法的郭嵩焘，后来顶替郭嵩焘的曾纪泽，驻德的李凤苞等全系清一色的汉人，这种情形怎能不使心存满汉成见的清政府内心着急呢！恰好这时候要讨论收还伊犁问题，又恰好要派一个前往俄国的使臣，这个机会自然就给了在满人中最有洋务、外交经验的崇厚。上谕说："崇厚向能办事，于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是以特派前往驻扎相机办理。" 1878 年（光绪四年）11 月，崇厚被"赏戴双眼花翎，头品顶戴，"怀里揣着特命全权大使的

委任状，从上海启程出发。

不幸的是已经出发的崇厚对国际谈判中风云变幻的复杂局面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甚至连伊犁在中国北疆的战略位置都没闹清楚。他只觉得收回伊犁就像把一只已经煮熟了的鸭子放进盘子，端回自己的餐桌便大功告成了。加上在他身上充溢着那个时代满族贵族特有的颟顸之气，所以他的信心远远超过了他的准备。

崇厚率领着一行 30 多人昼夜兼程，途经香港、西贡、新加坡，走印度洋、红海过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在法国的马赛登陆，接着在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柏林盘桓数日，终于在 1878 年的最后一天到达彼得堡。

不管崇厚有没有准备，反正沙俄政府是早有准备的。当他们听说中国已经派了专使前来谈判的时候，马上就伊犁问题展开了讨论。一向持强硬态度的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说伊犁是绝不能还给中国的；那个和垂死的阿古柏签订过划分"边界"条约的库罗巴特金（俄军参谋总部亚洲司司长）说："以所处的位置来说，伊犁是一个现成的，威慑力量极其强大的炮垒。因此从军事上看，我们必须占领伊犁，""如果我们由于已经轻率的许诺而不得不归还伊犁的话，则必须向中国提出要求，赔偿我们这 8 年来用于该地区的费用和 1863 年以来俄中贸易方面的损失，赔偿费用应为一亿金卢布，此项赔款用于西伯利亚铁路的建

设。”可是赖着不还难道不会出问题吗？外交部的看法比较谨慎，他们害怕不还伊犁的话，沙俄在华的长远利益就要丧失，而且本来就咄咄逼人的英国肯定会趁虚而入独占在华利益。讨论来讨论去，终于形成了一个基本倾向，如果非还不可的话，就一定要从这个问题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为此，俄国人精心设计了一套对付崇厚的办法。他们确定了软硬兼施的政策，决定先来个下马威，挫一挫中国专使的威风。当崇厚安顿妥当，来到俄国外交部商量递交国书日期的时候，俄国外交部的官员们瞪大了眼睛察看崇厚携带的证件，他们发现在证明身分等级的证件上居然漏掉了“头等”两字，这下他们就像发现了宝贝似地大作文章了。俄国人左盘问右审查，为这两个字，竟折腾了20多天，又向驻北京的俄国临时代办凯阳德打去电报，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打听清楚，这才确定了中国公使谒见沙皇、递交国书的日期。冬日的彼得堡一派萧煞之气。本来纬度就高，再加上涅瓦河、芬兰湾以及波罗的海吹进来的潮湿阴冷的空气，更使奇寒之中带着使人受不了的湿气。中国使团的成员，大都习惯于中国北方冬季的干冷气候，对这种阴冷潮湿的冬季实在没有心理准备。这一番考验并不比对他们“资格”的审查更轻松。

正当中国使臣们心灰意冷的时候，沙俄的政策忽然为之一变。1月20日，俄国外交部精心布

置了一场极其隆重的觐见沙皇的仪式，崇厚“从旅馆被接入一驾六匹马拉的皇家马车，他的随员也被接入一驾四匹马拉的皇家马车，并由宫廷典礼官伴随，”马车一路“得得得”地小跑，直驶皇宫。威严、隆重、排场甚至有些铺张的觐见仪式开始了。一个显贵的亲王亲引着崇厚和中国代表团步入大厅，将中国客人一一介绍给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摆出一副友善、和蔼可亲的样子，郑重地接过国书，整个仪式超规格超等级。用清政府官员的话来说就是自始至终“优礼有加”。仪式之后是盛宴款待。大杯大杯的伏特加倒进了中国官员的喉咙里，壁炉中燃烧着熊熊的火焰，气氛热烈极了。崇厚从身到心都暖洋洋的。他忘掉了这是数九寒天，忘掉了这是异国彼得堡，忘掉了20多天来的不愉快。他甚至觉得俄国人根本没有人们形容的那么阴险，那么狡诈。他陶醉了。

近乎于阿谀奉承的觐见仪式把崇厚搞得昏头胀脑。他天真地以为沙俄对大清国真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既无野心又充满同情。再加上布策和崇厚拉家常套近乎，甚至提到他和崇厚有10年之久的交情，对这一切崇厚大受感动，他差不多完全失去了戒备。这对本来就没有多少准备的中方代表来说，真是一个天大的不幸。

彼得堡觐见之后，正式的谈判转移到克里米亚半岛环境优美、温暖宜人的里瓦几亚。从1879年（光绪五年）1月到10月，历时9个多月。俄

方选定的谈判代表是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外交部官员热梅尼、驻华公使布策以及沙俄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梅尼热甫。

实际上，谈判开始的时候，沙俄政府曾经开了一个有关伊犁问题的特别会议。这个会议已为中俄谈判定了基调。只不过中国代表对此全然不知而已。主持会议的是陆军大臣米留金，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俄国对交还伊犁的态度。原则上可以交还伊犁，可是在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积极让步以前是不说归还二字的。那么什么是积极的让步呢？这就是要给俄国贸易方面更多的权利，赔偿“代收代管”费用的损失，还包括修改边界。所谓修改，自然是想再要走一部分中国领土。这个会议所定的基调，就成了里瓦几亚谈判中俄方的基本准绳。

在俄国人开特别会议的时候，中俄间的谈判已经在里瓦几亚开始了。由于俄方要等特别会议的精神，所以谈判之初他们总是含糊其词，拿不出具体方案。当崇厚拿出索要伊犁的节略时，格尔斯说，此“事关重大，拟将节略奏明国君，会商户兵两部总理方可定议。”后来节略被认可了，同时附上了俄国人的要求，他们说的简单得很，“大致分通商、分界、补恤俄民为三大端。”崇厚请问详细，俄国人才陆续将这三大端逐段逐句地解释了一番。此时，特别会议已经开完了，会议的精神传到了里瓦几亚，马上在这里得到贯彻，其

标志就是挖空心思利用伊犁榨到更多的油水。崇厚对这一切都不知端底，他只是觉得办外交，"惟以诚意相孚。"况且俄国人"相待如礼，"既然人家表现出雍容大度，自己当然不能显得太小气，所以崇厚慷慨大方起来，孰不知所有的慷慨大方都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代价的。就俄国人所要求的三大端来说，通商部分"曰中国西边省分准其贸易，曰天山南北各路妥协贸易章程，曰西边省分及蒙古地方设领事官。"这些要求在崇厚看来"盖为便益商民起见"，实在算不上过分。分界部分也是三条，"曰伊犁西南界，曰塔尔巴哈台界，均应稍加更改，曰天山南两国应将未定边界划界划清。"划界方面，崇厚也很替俄国人着想，他告诉总理衙门，本来由于伊犁战略位置的重要"俄国论者咸谓必不可还"，可是俄国皇帝和外交部却觉得为了敦崇睦谊应该还给中国，不过"特交还后力量不免稍弱，故不得不稍宽其界以为自固疆圉计，顾为地实属无几"。崇厚觉得割地也是再合理不过的事。至于补恤俄民部分，在崇厚往回打报告的时候，俄国人还没定出具体的方案，所以崇厚只能潦草地写到"论伊犁用费及俄民补恤两款则以数目无多，"等数目清楚了再汇报不迟。

对崇厚过分乐观的估计，和他对俄国人"无图利之心"的认识，总理衙门实在不大放心。接到崇厚的报告后，——这份报告来的很迟，在和俄国人谈了 5 个多月后，也就是 1879 年（光绪五

年）6月18日才收到，而且还是在总理衙门什么消息也得不到急得直催问的情况下才打来的，清政府赶紧给崇厚送去了意见，这里面包括上谕和总理衙门王大臣奕䜣的指示，告诉崇厚要提高警惕，要提防“俄国是否心存叵测”，特别不能在俄人交还伊犁之前贸然同意广开西北地区中俄商务，万一“即允为先行驰禁（指开放商务贸易——引者），设彼既得通商之利，遂其所欲而伊城仍复籍词延宕，中国岂能以已弛之禁复行收回？”这些担心实在不是多余的，所以上谕嘱咐崇厚，一定要“再四审度”，千万别顾此失彼。奕䜣说的更是详细，他告诉崇厚，“惟是事之利害当权其轻重，而情之真伪尤难于测度。俄人久据伊犁以为要挟，无非为贪占便宜起见。”“且洋人性情最为叵测，往往于彼有益之事我已照行，于我有益之事彼则翻悔。”奕䜣在这一条后面还特别列举了英国在烟台条约中反反复复争辩的例子，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洋人的狡诈，借此提醒崇厚“不可不为长虑者也”。千万别“因急于索还伊犁转贻后患。”总理衙门大概是实在放心不下，在这两份文件送去不久，又接连发出两项新的指示，怕崇厚颟顸行事。

不知崇厚收到这些训令后究竟怎么考虑的，也许是觉得朝廷既然已经给了我便宜行事的权力，那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皇帝的意见也好，奕䜣的命令也好，他都听不进去；也许是他实在觉得俄国人那么和蔼可亲，自己再反复计较面子

上过不去；也许是他觉的已经讨论的差不多了，假如再反悔的话，俄国人会跟自己过不去的。所以，对来自北京的这些指示，他没有在谈判中贯彻，反而趁着清政府等回信的间隙，赶快和沙俄画押签字。

1879 年（光绪五年）10 月 2 日，里瓦几亚是“黑色”的。这一天格尔斯、布策和中国政府代表、出使俄国大臣崇厚在《里瓦几亚条约》上签了字。由于条约是在俄国的海滨城市里瓦几亚签订的，所以叫《里瓦几亚条约》，又因为它专为伊犁问题而订，所以又叫《伊犁条约》。同时还签订了三个附属条约，它们是《瑷珲专条》、《陆路通商章程》以及《兵费及恤款专条》。

崇厚的心情复杂得很，因为他心里清楚，朝廷对他与俄国签订的条款很不满意，就在签约的前几天，他还接到了奕䜣打来的电报，告诉他，如果照他来信中汇报的情况“有碍回疆全局，断不可行。”鬼使神差的崇厚真不知动了哪一根筋，竟置政府的训令于不顾，非同俄国签字画押不可。怪不得俄国一开始对是否有“头等”，是否有“全权”那么关心，那么认真，原来他们觉得只要有了便宜行事的全权，那么一签字画押条约就算铁板钉钉子，中国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崇厚签字之后，立即回彼得堡收拾行装，11 日便匆匆上路，走南洋回国了。

与崇厚的心情恰好相反，格尔斯和布策的心

情却好极了。10 月的里瓦几亚秋高气爽，里海吹来的阵阵微咸的海风，轻拂着里瓦几亚的树木花草，也轻拂着人们的面颊，这一切都使格尔斯和布策感到格外惬意。尽管经历了一场长达 9 个多月的谈判，可是他们的脸上却没有一丝倦意。这大概是因为谈判没费他们什么力气，也没劳多大精神。更何况这样的好心情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了。9 月 18 日格尔斯在给朋友的信里就说："我希望条约不久即可签订。议定书拟定得很好，巧妙地避开了困难而毫不损害原则，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议定书得到松花江上的无可否认的利益。"这个原则，就是沙俄蓄谋已久的侵略原则，符合了这个原则，沙俄政府的上上下下大小官员们能不满意吗？格尔斯和布策能不满意吗？

使沙俄政府满意的，正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丧失。

让我们看看这个使格尔斯、布策心花怒放的条约到底说了些什么？

《里瓦几亚条约》共 18 款，其主要内容包括 4 个方面：

第 1，有关割地问题。它主要集中在条约的第 1 条、第 7 条、第 8 条。条约规定一方面由俄兵代收代管的伊犁 9 城交还中国，做为报偿，中国则同意把伊犁西部，既霍尔果斯河以西和伊犁以南的特克斯河流域割让给俄国。同时，在北疆的额尔齐斯河流域中国将丧失斋桑湖以东地区和哈巴

河周围的大片土地；在南疆，通过在新划定喀什噶尔地区两国的边界，使俄国又占去南疆不少领土。这样，伊犁虽然收回了，但是它却变成了一个三面被俄国包围的孤城。从此它失去了战略上的优势，很难防守了。

第2，有关赔款问题。主要集中在条约第6条，它规定中国政府同意赔偿“大俄国自同治十年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并将补恤在中国境内被抢、受亏俄商及被害俄民家属之款共银卢布500万元。”该款自换约之日起1年内全部还清。这笔银子折合中国白银28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强。

第3，关于通商贸易。《里瓦几亚条约》规定俄国商人可以在中国蒙古地方和新疆全境得到免税贸易的特权。俄国商人可以在没有俄国领事馆的地区任意修建铺房行栈，另外还增设了几条通商路线：一条由尼布楚至库伦，经张家口、通州到天津；另一条由科布多到归化城，经张家口转运天津；第三条由新疆经嘉峪关、兰州、天水、西安或汉中直至汉口。这样由陆路东可至天津，东南可至汉口，整个中国西北、西南部成了俄国人自由贸易的天下。

第4，关于增设领事馆。本来俄国人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等地就有领事馆，在《里瓦几亚条约》中，又添设了7处领事馆，它们分别设在嘉峪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吐

鲁番、乌鲁木齐和古城。这样俄国在新疆的势力就大大增强了。

通过《里瓦几亚条约》，俄国从中用“得到的东西，已经超过了甘愿冒战争的危险来保持的东西。”

《里瓦几亚条约》使总理衙门惊愕了。奕䜣觉得如此“收还伊犁，与不收回或尚不如不收。”本来那些洋人就“惟利是视，凡事于彼有益者虽中国未允之款尚且争之至在，”孰料崇厚却独断专行，擅自签约！

祸已铸成，该当何罪！

8 国人皆曰可杀

崇厚未奉旨就匆匆交代了工作，启程回国了。人还未到，朝廷内外弹劾之声已经骤起。

因为关系紧要，所以奕䜣在接到崇厚已经签字画押的消息以后，马上向皇上和慈禧太后汇报情况，并于同一天（10 月 7 日）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伊犁将军金顺和有关官员发出了简报，向他们通报了伊犁收还的情况并征求补救的办法。这件事与左宗棠的关系最大，如果下决心拒绝此约的话，那么左宗棠率重兵加紧边务正是当务之急。所以 10 月 9 日，奕䜣又给左宗棠发去上谕和总理衙门的意见，告诉他要赶紧“统筹全局，权其利害轻重，一并核议密陈，请旨遵行，以昭慎重。”一下子，局势再度紧张起来，而且不仅是与沙俄接壤的西北、东北地区紧张起来，连南北洋海疆也同样紧张起来。

不几天，朝野的奏折像雪片般地飞来了。这

里面有讨论解救办法的，有要求惩处崇厚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情崇厚，为他说上两句好话的。

苦心经营陕甘、新疆近20年的左宗棠激愤了。他说如果同意《里瓦几亚条约》，则“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此境一、二百里间皆俄属部，孤注万里，何以图存？”再者说，我重兵6万镇守关外，还没有和俄国一比高低、胜负，就丢弃这么多土地，这不是太丢面子了吗？况且沙俄之辈“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为此左宗棠请缨再战，他说：“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务期内外一心，坚不可撼，维持大局，仰副宸谟。”这封奏折洋洋洒洒，慷慨陈词，长达数千言。他不仅力陈《里瓦几亚条约》对国家的危害，而且还分析了伊犁前线形势，布置了各路精兵强将，还预算了未来战争的用饷情况。这一奏折，对清政府最后拒绝《里瓦几亚条约》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几乎在左宗棠上奏折同时，许多反对《里瓦几亚条约》并要求惩办崇厚的奏折都送上来了。举国上下异常激愤，舆论哗然，一致认为崇厚当斩，条约当拒，伊犁当以武力收回。

10月19日，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的奏折到了。他认为俄人要挟太甚，如果如约与之大片土地，则“我不啻入其伏中，求一举手动足而

不可得。”所以“应将使臣所议作为罢论。”人们最担心的是“既允复翻其曲在我。”沈葆桢认为，万国公法是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特别是当所派之人“若有违训事件则君不必准也。”也就是说，崇厚虽系全权大臣，但犯了违训的错误，所以中国政府可以推翻他所缔结的条约。况且《里瓦几亚条约》中已明文规定批准换约之后才能生效，所以政府可以拒绝批准，这不能算是违约。沈葆桢特别提出，万一这些都不能做，充其量我们不收伊犁罢了，就像“毒蛇螫手，壮士断腕。”干脆拿出点魄力。

李鸿章的意见属于低调的。他也认为这个条约损害了国家利益。不过他觉得这是国际交涉中的大事，绝不能冒然行事，一定慎重再慎重。因为俄国在伊犁已经营10年，本来就不想归还，万一处理不好，不但伊犁收不回来而且再挑起边衅就划不来了。这是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李鸿章认为“中国士大夫风气向以出使为畏途，平时讲习俄事者尤少。”万一处理不好，特别是把肇事者法办得过重的话，将来还有谁敢言洋务，敢再出使海外！他还认为崇厚失策于在光想收回伊犁而没去考虑商务、界务的损失，罪在“失之轻率”。那么能否拒绝呢？李鸿章认为虽然国际公法是允许拒绝的，可是他又认为“自古交邻之道，先论曲直，曲在我则侮必自招，用兵之道亦论曲直，曲在我则师必不壮。”假如推翻成案，亏理在我，则

"我既失伊犁而复居不直之名，为各国所讪笑，则所失更多。"况且俄国最能凭空生疑，中俄边界长万余里，"实属防不胜防"，万一边衅再起怎么办？由于这些担心，李鸿章觉得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慢慢来，等崇厚回来，汇报了谈判中的种种细节之后再与总理衙门好好商量，看看能不能在换约的时候挽回一些权益。万一什么也改不过来，则赶紧对西北的商务进行新的规则，搞好立法和用人工作，这样就算俄国在条约中占了便宜，但由于我们制度完备，立法全面，也不至于出现更坏的局面。李鸿章的低调态度是与他在海防塞防问题上的见解一致的，也和他一贯搞妥协退让外交有关系。但是《里瓦几亚条约》使中国人感到耻辱，举国上下一片谴责痛斥之声，很快把李鸿章的低调冲得无影无踪。

12月10日，奕䜣研究了左宗棠、沈宝桢和李鸿章的报告以后，上了奏折，重点分析了崇厚丧权辱国的罪行，显然受沈葆桢对国际公法诠释的启发，把处理问题的基点放在崇厚违训的角度上，以此来争取拒约。

1880年（光绪六年）1月2日，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上了弹劾崇厚的奏折。他慷慨激昂地说，朝廷遣使外国意在安边固防，从古至今奉使诸臣"未有荒谬误国如崇厚者也"。崇厚所为有如"因索地而弃地，欲弭衅而招衅，""其心但知畏敌而不畏皇太后皇上，"特别是"不请谕旨擅自许人，

不候召命擅自归国”更是不可饶恕。而且归国之后在上海等处流连盘桓，“节节逗留，欲伺上意渐解再图入见。”黄体芳最后说:“论奉使则不忠，论复命则不敬，不忠不敬，邦有常刑……。”对这样专擅大胆的官员不论罪不处罚，国还能称之为国吗？黄体芳的奏折一时间引起很大反响，大家都觉得不重治其罪不足以警示后者。同一日，发下上谕，将崇厚交部议处，同时要求六部九卿全体官员都来讨论此案。

京师沸沸扬扬，到处都在讨论伊犁问题，讨论崇厚论罪当斩，正在这个当口，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又送一弹劾书。张之洞下笔数千言，纵横捭阖，全面分析了《里瓦几亚条约》的危害，认为18条中为害最大的是“陆路通商由嘉峪关西安汉中直达汉口，秦陇要害，荆楚上游尽为所据。”由此一来，“边圉虽防，堂奥已失”。他列举10条“不可许”的理由，接着就讨论会不会由于拒约而重新引起边衅的问题，他认为“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他要求清政府下定决心惩办崇厚，做出必改的姿态，因为“无理之约使臣许之，朝廷未尝许之，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国人皆曰可杀者也。”只要重治其罪就可以“杜俄人之口，”总而言之，重治崇厚，坚决拒约，否则的话，徒收伊犁之空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是有新疆尚不如无新疆也。”张之洞的话铿锵有力，反映了绝大多数官员的呼声。结果疏上

第二天，也就是1880年1月17日，朝廷发下上谕，将崇厚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讨论了几个月的问题终于有了结果。2月20日，庶吉士樊增祥奏请定崇厚违训越权罪亟正典刑。他说，现在已经到了不杀崇厚不足以警天下，不足以谢敌国的时候了。这一段时间朝野交章论劾，全国舆论皆以崇厚罪无可逭，是以“诸臣既知条约之万不可许，即知崇厚之万不能生。”早年耆英因派赴天津与英法联军交涉未请旨而擅自回京就曾获罪赐死，“况崇厚目无君父，贻害国家，其罪甚于耆英百倍。有臣若此除论斩之外本无他条可援，”如果放崇厚一马，则天下忠臣志士都会为此寒心。只有杀了崇厚，曾纪泽才能对俄国有坚决的态度。俄国才能知道中国必改条约之决心。所以“欲令曾纪泽使不辱命，惟杀崇厚是以儆之，欲俄人不执前议，亦惟杀崇厚足以谢之。”更何况，中国准备治崇厚误国擅权之罪，“俄国使臣巴（凯阳德）咆哮于总署，而上海洋报复故为疑讽之词，足见崇厚之与外人久已联合一气。”也就是说崇厚已经当了汉奸，事关国体，能不杀吗！顿时，京城一片喊杀声。3月3日，上谕下达，崇厚被判斩监候，当啷一声入狱了。

后来由于外交的需要，崇厚保住了性命。4年以后他交了30万两白银赎罪，这才被放了出来。再以后他变成了京师中默默无闻的小官，直到光绪十九年病郁而死。享年六十有七。

9 受命于危难之际

兴冲冲地坐等换约的沙俄听说清政府要治崇厚的罪，最先跳起来。

1 月 4 日，沙俄驻华临时代办凯阳德听说把崇厚开缺“先行交部严加论处，”第二天，就匆匆跑到总理衙门，大叫大嚷，质问中国政府把崇厚开缺并议处“是何用意”？未等答话凯阳德又说：“你们抓了崇厚，对未来的中俄关系将有直接的影响。崇厚去年代表中国同俄国签订了条约，就俄国方面讲，纯粹是为了中俄之间的友好才诚心诚意地与你们订约的，可是你们却把定约的代表开除了，还要治罪，这不是给我们政府下不来台吗？”奕䜣说，就中国而言，一般在决定大政方针的时候，都要征求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全体官员的意见。《里瓦几亚条约》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样做无可非议。至于为什么把崇厚开缺并交部议处，那是因为他没有得到政府的命令，擅自回京而引起的，纯属中国的内政，与你们俄国毫无关系。凯阳德一听到此事为中国内政，外人无权

干涉的话，立即跳了起来，他说，如果我把这件事向我的政府汇报，我政府一定觉得这是不友好的表现。既然你们说这是中国的内政，那么俄国使臣在北京便无事可做了。凯阳德说罢，怒气冲冲向外就走，同时还甩下一句话，既然无事可做，“只可就走”。

俄国人动怒了，这无疑给中国政府施加了压力。因为中国政府对崇厚以及对条约所执的任何态度，都可以视作是中国推翻成案的表示。为了缓和紧张的情绪。二天以后，奕䜣亲自跑到俄国驻华使馆的凯阳德宅邸去解释，尽力说清中国的态度与对俄关系无关。凯阳德阴阳怪气地说，我来中国已几度春秋，这几年所有的中俄交涉我心里都有数，简单地说，在中俄关系方面，“俄国遇事每有和好之意，中国遇事每有拦阻之心。以前中国边界官办理交涉事件，俄国国家多不满意，迨中国饬派钦差到俄，俄国以为中国有和好意，将从前不满中国之处姑置勿论。”本着这种好心，俄国人才派了代表同中国使臣进行协商谈判，而且在谈判中，“所让中国之处不少”。其中不少是俄国百姓以及欧洲舆论都认为是不该让的东西。然而就是为了“友好”，我们才“特排众论，将不应让与中国之处全行相让，岂知愈让愈不见好。”说到这里，凯阳德搬出惯伎，以战争相威胁。凯阳德说：“俄国并非无力量，至条约准与不准，在俄国总是一样。”奕䜣避开了凯阳德的锋芒，他说我

今天来不与你讨论交涉过程中的谁是谁非，只是告诉你以前的中外交涉大都在北京办理，中国的谈判代表可以随时和政府商量，唯独这一次是中国派使臣前往俄国议定的，而且议出来的条约中国的官员们并不清楚，所以才将条约全文发下去叫大家讨论，这是为郑重国事起见。特别是崇厚临走时曾经明定了他的权限，这就是崇厚有“定办之权”，而朝廷则有“批准之权”。不知道阁下是否可以理解这一点。奕䜣再四申明，无论怎样处理崇厚，无论批准不批准《里瓦几亚条约》，都不影响中俄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反复申说之后，奕䜣仍然怕由于翻译的缘故造成某种误会，他特别拿出一份预先写好的备忘录，并自交给凯阳德，希望他不要误会。听了这一席解释，凯阳德也觉得中国并非无理，可是他还是说，无论如何俄国把对崇厚的任何处罚都视做“中国有蔑视俄国之心。”

后来，中国政府对崇厚的处罚升级了。由交部议处变成了革职拿问，又由革职拿问变成了斩监候。并且在2月19日发表声明，说崇厚赴俄办理交涉“多有违训越权之处”，“经内外大小臣工一再会商妥议，佥谓事多窒碍难行”。所以“特简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出使贵国钦差大臣”，重新谈判伊犁问题。

当处治升级的时候，沙俄对华的要挟也升级了。听说崇厚被定了死罪，只等着秋后问斩，可

把沙俄政府气坏了。凯阳德闻讯，马上告诉总理衙门，要降下国旗，断绝外交关系。那个还留在彼得堡的驻华公使布策召见了中国驻俄署理公使邵友濂，告诉他如果中国将崇厚真的治了罪、砍了头，那么中俄关系也就至此了结了。

沙俄为了使外交压力更大一些，还请来了英、美、德、法等国的公使，让他们替俄国游说，替崇厚说话。一时间，国际舆论对判崇厚斩监候颇有微词。

外交压力而后是军事压力。这一手是沙俄一贯使用的。1880 年 3 月，俄国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受命做好了对华战争的准备。中俄边境线上顿时紧张起来。西伯利亚方面增兵 15 000 人，各种兵器、枪支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到了伊犁附近，一下使伊犁的俄军比 1871 年到 1877 年时的驻防增加了 6～7 倍之多。他们在这一带修筑工事，还开辟了一条通往北疆的军用专路。摆出了一副随时可能向东挺进的姿态。考夫曼还给西西伯利亚总督卡兹纳科夫打了招呼，让他在斋桑泊一带布署军队，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北疆的布伦托海和奇台。如果战争真的打响的话，这两支上万人的队伍会一下子冲过边境线扫荡南北疆。卡兹纳科夫毫不含糊，不到几个月，就在中俄边境西北一段上集结了 12 800 多步兵，6 200 多骑兵，还拉来 62 门大炮。

布署好兵力以后，考夫曼叫来阿古柏的儿子，

告诉他如果中国和俄国交了火，可就到了你“复国”的时候了，你应着手积极准备。

西线是未来战争的主战场，屯兵的数量自然多一些。可是沙俄为达到武力讹诈的目的，他们在东部与中国接壤的地区，也紧急调运了大批军队，在乌苏里江东岸和黑龙江北岸，一支 12 000 人组成的正规军虎视眈眈地望着中国。这还不够，布策告诉邵友谦，一支由 23 艘舰只组成的海军正从黑海出发开往日本长崎，准备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一举封锁渤海、黄海，威胁北京。

三面包围之势形成了，战争态势出现了。——中俄关系急剧恶化。

来自外交与军事两个方面的压力，使准备重新开始的谈判格外地艰难了。

此时的曾纪泽，正在法国巴黎的中国使馆里。

曾纪泽（1839－1890），字颉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长子。除了他早年深受曾家严格的家教、举止有规矩以外，最大的特长就是知洋务懂外语了。1877 年曾国藩病死，他承袭侯爵。1878 年，曾纪泽出任驻英法公使。

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最后两年中，他和崇厚前后脚来到了欧洲。当崇厚办砸了事，无人收拾残局的时候，清政府最先想到的就是住在离彼得堡不太远的曾纪泽。

历史证明，清政府的这次任命是绝对正确的。

3 月 2 日曾纪泽接到了总理衙门的电报，告

诉他朝廷已经决定由他兼任驻俄公使，重新谈判伊犁问题，曾纪泽的心情不由得沉重起来。他预感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差事。此后的几个月，曾纪泽开始做赴俄的准备工作。他深知要想从俄国人嘴里掏出已经吃进去的东西决不是轻而易举的，没有深思熟虑和坚毅顽强的精神，没有通盘筹划是完成不好使命的。所以他开始收集情报，研究地图，制订方案。他在日记里有所记录的有：

3 月 24 日，找来法国新任驻福州领事梅叶商谈。梅叶曾驻俄多年，对俄事非常了解，称得上是俄国通。曾纪泽诚恳地向他请教俄国问题。

3 月 26 日，研究大清会典舆地图，“取鄂(俄）刻舆图及西人中亚细亚图核对良久”。

3 月 31 日，赴伦敦使馆，此前与许多在法的朋友商谈俄事。

4 月 3 日，在伦敦拜会各国驻英使节，同俄国公使晤谈甚久。

4 月 18 日，在伦敦使馆内闭门研究总理衙门送来的有关伊犁谈判的各种文件。

5 月 29 日，与总理衙门电商俄事。

5 月 30 日，英国人伯尔奇来使馆谈俄事。伯尔奇建议：“中国欲保和局，必修战备。”

6 月 2 日，会见英外交大臣，与之谈俄事。

6 月 27 日，与总理衙门电商俄事。

7 月 7 日，与总理衙门电商俄事。

7 月 10 日，研究伊犁交还的有关文件。

7月12日，至俄国驻伦敦大使处与俄大使晤谈，“其言皆酬应虚文，听之甚甘而意向不可测也。”同日，研究有关文件“极久”。

7月14日，再赴巴黎。

7月17日，研究“俄案钞件甚久。”

7月23日，与俄驻法大使辞行，“谈颇久。”

这只是曾纪泽随手记下来的准备工作，其实他在赴俄之前所做的远不止这些。他深知这次是去“障川流而挽已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所以他在出发之前，就凭着自己在巴黎、伦敦的各种关系，刺探各方面的情报，尽可能使自己准备得更充分一点。他在伦敦政府人士那里得知对已订的《里瓦几亚条约》俄国政府中有不同的看法，“布策诸人虽坚执各条不肯放松，而俄国皇帝与其外部丞相吉尔斯实有和平了结之意。”鉴于英俄在远东利益上的矛盾，曾纪泽的情报是靠得住的。

曾纪泽除了分析情报、研究地图、察访各方面意见而外，他还熟悉国际政治。他知道，第7次俄土战争刚刚过去了两年，俄国在这场战争中获利不小，他们不但重新得到了巴统地区，还抢到比萨拉比亚，从此黑海沿岸、高加索地区和巴尔干半岛上的大片土地都划归俄国。这些东西还有待于消化。而且失败的一方是不那么甘心的，所以沙俄在黑海的武备丝毫也不能松弛。俄国虽然打赢了战争，可是却在战争中大失元气，就国家

财力而言，再支持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别看俄国人在边界上调集兵力，还派了那么多艘战舰跑到日本海，可是其中一半以上是虚张声势，纯属吓唬人的。尽管沙俄虎视眈眈，非要给中国点颜色看，可是当时的国际舆论都倾向于在谈判桌上解决中俄之间的争端，沙俄肯定不能置这些舆论于不顾。再者，沙俄也要权衡利弊，如顽固地坚持《里瓦几亚条约》中"已经"得到的利益，万一把中国人逼极了，真的出了兵收复伊犁，那么原先得到的利益也可能告吹。

更让曾纪泽有信心的是清政府所做的工作。为了配合新一轮的外交谈判，为了缓和一下过于紧张的局势，清政府释放了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崇厚，宣布"暂免斩罪"。这样在外交上就争取了主动。同时清政府命令西北前沿做好开战的准备，暂办新疆军务，年届69岁的左宗棠也从肃州（嘉峪关）移节哈密，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式。曾纪泽知道，在国际政治中，以武力为后盾在谈判桌上往往会产生更有利的结果。

曾纪泽受命于危难之际，可是他满怀信心。曾纪泽到任之时，曾给即将离任的署理公使邵友濂写了一首送别诗，表示自己要在"仓卒珠盘玉敦间，待凭口舌巩河山"，字里行间充溢着必胜的信心。后来在改订条约的那些日子里，他果然做到了"啮雪咽旃，期于不屈"，以顽强的努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挽回了部分利权。

1880年（光绪六年）7月26日，曾纪泽移驻彼得堡。随行人员中，有不少曾纪泽的顾问。一切都从头开始了。

10 艰难的使命

彼得堡的夏天相当凉爽。这是因为彼得堡城座落在波罗的海东南的芬兰湾顶尖之处，海洋性气候相当显著。加上彼得堡地区多湖多河多沼泽，海风掠过上空，全城凉爽得很。夏天显然比冬天好过得多。

曾纪泽是盛夏来到彼得堡的，此时俄国人的态度相当严峻。8月4日，曾纪泽前往俄国外交部，商谈递交国书事宜，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会见了曾纪泽，在坐的还有俄国外交部官员热尼科甫，驻华公使布策。格尔斯盛气凌人，"面冷词横，始言约不可改，继则屡言各国订约诚有商改之事，惟未经商改即罪其全权大使，增兵设防，有意为衅……。"用一种指责的语气"诘难良久"。说了半天才转入了正题，同意在请示沙皇之后再讨论递交国书的日期。对这种不利的开端，曾纪泽是有思想准备的。他来俄国之前，曾经给熟知洋务的丁日昌写信，分析了重新谈判伊犁问题的困难，信中说："夫全权大臣与一国帝王面订之件，

忽欲翻异，施之至弱极小之邦，然且未肯帖然顺从，况以俄之强大，理所不能折，势所不能屈者乎?”正因为有了这些心理准备，所以他对俄国代表“面冷词横”的态度抱以不亢不卑，坚持改约的原则。曾纪泽回到寓所把第一天遇到的情况和顾问们做了长时间的交谈，以期商量出一个好的对策。

既然格尔斯说各国订约诚有商改之事，只不过中国治崇厚之罪让俄国面子上受不了，那么，就先从缓和矛盾入手吧。

8月8日，清政府批准将原议的边界各案先期办结；8月12日宣布将崇厚免罪开释，堵住了俄国人之口。在这些日子里，曾纪泽呆在彼得堡的使馆里闭门不出，要么专心研究中原地区地图和中国西北地形图，要么与同行的顾问们旦夕讨论。稍有闲暇就读英文，看小说。表现出一副大将气概。但双方的尖锐矛盾又使曾纪泽不免心身焦虑，弄得身体不适，居然便中带血。显然，曾纪泽并不轻松。

8月3日，伊犁谈判正式开始。

第一次谈判，曾纪泽正式提出了中国方面关于修改《里瓦几亚条约》的6点建议。内容是：第1，要求沙俄交还伊犁全境，而不割让周围地区；第2，有关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与俄国交界之地，仍照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记》分界，对其中非改不可的地段，主张双方特派大员查勘并秉

公议订；第3，交还伊犁之后中国方面才允许沙俄到嘉峪关通商，才允许俄国商人开辟第二条新的商路直通尼布楚的科布多；第4，中国方面同意沙俄在嘉峪关一地增设领事，而《里瓦几亚条约》中另外的6处领事点暂停添设；第5，中国方面同意在哈密、巴里坤、古城三处之一设货栈；第6，俄国在新疆全境不能享有处处免税的特权，否则中国方面吃亏太大。曾纪泽逐条逐句解释完了之后，格尔斯沉默片刻才说出一句，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将《里瓦几亚条约》"全行驳了"，在坐的俄国代表全都一脸不高兴。为了研究中国方面的新要求，8月24日，俄方要求中国代表把所提的6条建议以备忘录的形式交给俄国政府。

8月25日，俄国政府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中国的新建议、新立场。通过这次会议，俄国确定了新的谈判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三，一是保持《里瓦几亚条约》的基本原则，只能就其中的部分进行谈判；二是中国方面如果坚持归还特克斯河流域，那么必须在其它方面诸如赔款、其它领土做出让步；三是俄国方面为了不失尊严而不做让步。这些原则最基本的一点就是《里瓦几亚条约》的大原则不能变，只能做少许改动。

为了逼中国政府在6点建议的立场上后退，沙俄举起了令清政府不安的杀手锏。他们宣布不再彼得堡继续与曾纪泽谈判了，而是派布策前往北京谈判。

这可实在是厉害的一招。在那个时代，清政府最怕的就是带着几支快枪，乘着大兵船直趋北京的列强谈判代表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些洋鬼子一入中国堂奥，气焰顿形嚣张。他们总是让清政府意识到，跟在他们身后的那些炮舰绝不是吃素的。而且他们知道，一旦来北京，靠炮舰政策撑腰，想要得到什么就一定能得到什么。中国官府中的那些官僚一向是谈“洋”色变，把谈判视作畏途。列强们全都看准了清政府的致命弱点，中国人不愿意在北京谈，那就非去北京谈不可。

8 月 28 日，沙俄正式通知中方代表，由于曾纪泽所提的 6 条是将《里瓦几亚条约》全行否定，由于中方代表缺乏和谈诚意，所以俄方拒绝再在彼得堡谈下去了，改派布策前往北京，而且布策已经出发了。与此同时，俄国人提出 4 条意见，第 1，要求中国政府赦免伊犁居民；第 2，要求中国政府赔偿代收伊犁所花兵费；第 3，要求中国方面为那些自愿归附俄籍的伊犁人提供土地；第 4，修改边界。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威胁。谈判刚刚开始，俄国人就单方面地中断了谈判。充分表明了俄国政府的蛮横。热梅尼说得好，俄国的这个举动就是为了给“中国政府一个教训，是对它拒绝批准在这里缔结的条约的惩罚”。这一招果然是有效的。

总理衙门一听沙俄派了布策来北京谈判，果

真慌了手脚。好像布策一来，大难就要临头了。总理衙门急忙给曾纪泽打去电报，告诉他千万要坚持在彼得堡开议，不能让布策来。因为“布策挟兵船而来，必且于十八条之外更多无理要求，应之则贻患尤甚，拒之则兵衅立开，”仿佛满朝文武百官竟奈何不了一个布策，大局已不可收拾了似的。总理衙门还说，你曾纪泽在彼得堡能拿回多少利益就拿回多少，就算 18 条完全不能挽回，《里瓦几亚条约》仍不得不批准也没关系，反正比布策来华“多方挟制，处于不得不允，其利害轻重又复大相悬殊”。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在朝廷看来，《里瓦几亚条约》丧权是小，布策来华多方挟制才是大。反正你曾纪泽一个人在彼得堡顶住，别让俄国人来北京添麻烦就行了。

真按朝廷的意思，曾纪泽可以不费什么力气，可以无所作为。可是曾纪泽却偏要有所作为。不过，不做任何让步，谈判就无法进行。

9 月 18 日，曾纪泽再次来到俄国外交部，要求继续在彼得堡谈判。他告诉热梅尼，请他放心，“但有可让之处，我必酌量相让。”这是一个新的姿态，热梅尼赶紧写信，告诉陪同沙皇去了克里米亚的格尔斯，“这次会谈给我的印象是，侯爵和他的政府确实有和解的愿望。”陆军大臣米留金也得出了新的看法，他说：“中国问题有了新的转机。以公开和秘密获得的所有情报看来，清政府真是被我们的作战准备和外交家们的建议吓坏了，非

常愿意在彼得堡结束谈判，并赋予曾公使以最广泛的权力，只求不把谈判移到北京”。这回俄国人满意了，他们甚至有些飘飘然起来，觉得曾纪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俄国人情不自禁地断定讹诈已经成功了。他们召回了已经跑到马赛的布策，决定继续在彼得堡谈下去。他们觉得到北京去敲诈毕竟不如就地敲诈来得痛快。况且现在已经到了想拖就拖，想快就快，想中断就中断，总之可以任意操纵谈判的地步。

在等布策回来的这些日子，俄国热衷于想象在日后的谈判中会得到怎样的利益，而且这些想象总是超过了实际，显得那么漫无边际。财政部说，归还中国领土是小意思，关键是怎样从中国人那里得到更重要的商业优惠，而商业上的利益才是无限的，随时随地都可以带来利益，比领土划得来；外交部认为，重要的是保证中俄之间边疆的正常状态，然后再去追求尽可能大的商业利益。那个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头脑最热，一会儿说干脆向中国要一亿金卢布做退还特克斯河流域的补偿，一会儿说干脆从伊犁北边割取一块相等的土地，再加上一条通往内地的道路为补偿；海军部想得最多的是在乌苏里江那边打主意，认为在黑龙江一带以及乌苏里江以西的地方对俄国的远东海军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俄国人的想象力终于插上了一双翅膀，越飞越远了。

10月1日，布策回来了。为了不致于再陷入僵局，双方决定先不举行正式的谈判，而是采取私下会谈的形式，互相摸底。

又像从前一样，布策一见到曾纪泽，先对他的代表身分产生怀疑，非要看看他的证件上有无“全权”字样，假如没有全权，俄国人就不与之谈判。直至曾纪泽表示有权谈判签字的时候，这种纠缠才算结束。接着，布策直截了当地问曾纪泽有什么样的新方案，不妨先拿出来看看。为了打破僵局，曾纪泽拿出了一个新方案，这个方案在8月23日6点建议的立场上向后退了一大步。而且充分考虑了俄国方面的立场，答应赦免伊犁居民，答应补偿俄国“代收”伊犁之费，同意让出适当的地盘“以便安置迁之民”。但是地点肯定不是特克斯河流域，因为这地方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另外对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改界问题，中国方面也答应“派员前往勘定。”

这一步可退得不小，基本上符合8月28日俄国政府给清政府照会中的要求。这个新方案使俄国觉得可以研究。后来曾纪泽又把方案以节略的形式誉写清楚，交给了布策。谈判总算又有了点眉目，这回总该顺顺当当地开始了吧！

但事情的发展总与人们的善良愿望相反。本该顺利举行的谈判又卡了壳。原因并不是中国方面的让步太小，而是沙俄的价码又升高了。

节略寄到克里米亚，格尔斯在黑海之滨传来

了话，说中国的新建议与原来的6点建议没什么两样。于是布策像鹦鹉学舌一样，说中国的新建议并无相让之处。中国明明退了那么一大步，为什么俄国人还说没有退让呢？

关键的一点是特克斯河没有让。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同俄国的认识是一样的，因为不论对谁来说，这条河及河两岸的土地都太重要了。

特克斯河流域位于伊犁之南。就伊犁形势而言，其北、其西都与俄国山水相连，无形胜可守。只有东部和南部是中国辽阔的领土。伊犁就是靠这两块疆土傲然挺立着。如果再把南部的特克河流域割让给俄国，伊犁势必成了三面环敌的孤城，诚如左宗棠所说的，自此以后伊犁“孤注万里，何以图存”？所以特克斯河绝不可让。俄国人觉得，特克斯河流域和穆扎尔特山口对他们相当重要，因为穆扎尔特山口是通往南疆最便捷的通道，而特克斯河则是伊犁的南部卫士，如果拿走了南部卫士，至少就可以在伊犁之南打入一个长形的楔子，这样既使归还了伊犁也没有多大关系了。

俄国人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们想拿特克斯河做交易，用它来做敲诈的筹码。你们不是觉得特克斯河是“要紧之区，势难割让”吗？那好，如果我们让步的话不拿出让我们满意的东西，这块地方是绝不还给你们的。一想到特克斯河是个大筹码，俄国的政客和军人们又激昂起来了，他们的想象力在要土地还是要金钱之间徘徊，当这种

想象发挥得无以伦比的时候，谈判开始了。

从1880年（光绪六年）10月6日到1881年（光绪七年）2月24日，谈判进行了4个多月。比原来俄国政府给的谈判期限整整多出了3个月。

谈判相当艰难。因为在贪婪与忍让、敲诈与宽容之间是没有限度的。

曾纪泽同俄国人的谈判，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每一个问题都是对意志的一种考验。

最先讨论的也是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割地问题。

在《里瓦几亚条约》中，俄国人没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以及额尔齐斯流域的斋桑泊以东地区、哈巴河地区。使得伊犁成了三面环俄势难攻守的孤城。这次曾纪泽要争的，是伊犁南部的特克斯河流域。

10月6日，布策首先提出了割地问题，因为割地是和交还伊犁"连"在一起的。俄国人说什么也不能白白奉还伊犁，这个补偿要定了。而且还"以相抵之地"为代价。俄国人本想要伊犁以西、以南的土地，并不是看中这些土地的"价值"，而是认为这一带时有变乱，这些变乱"妨碍"了俄国的稳定和利益。所以"不得不留此地以保疆圉，且以安置伊犁迁出之民"。这是明显的敲诈，曾纪泽看出来了，可是他不能再重申收回伊犁全境的主张，因为会惹火了俄国人，他们再跑到北京谈判岂不更麻烦？何况总理衙门已经下

了死命令，只准在彼得堡，不得来北京谈判，曾纪泽只能在这个前提下尽可能争取到最好的结果。他说，中国政府已经同意赦免伊犁居民，想要迁出的人想必是不多的，所以给你们伊犁西边的土地已经足够安置他们了，可是特克斯河我们不能给。布策说，特克斯河对你们，对我们是同样重要的，如果非由我们让步的话，那么你们不拿出一块价值相等的土地我们是不答应。

话锋一转，布策又气势汹汹地问，你曾纪泽有没有"定界"的权力？如果你无权那么只能到北京商量了。曾纪泽坦然而答，划界割地的权力我是有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答应把中国的土地割给你们。

布策说：《里瓦几亚条约》中，这些土地早就归我们了。

曾纪泽说，可惜，这个条约没有批准。

布策说，你们想收回特克斯河，那么请给相应的补偿。"沿海地方可否找到一块合适之地？"

胃口越来越大了，曾纪泽的态度很坚定，可是他的分寸却很难掌握。因为俄国人知道，中国政府已经把他"钉死"在彼得堡了，他们看曾纪泽不肯退让，马上又拿出了"决裂"的武器，迫使曾纪泽就范。格尔斯传来了话，如果曾纪泽拒绝的话，那么谈判只好停止了，地点也将转移到北京，那时如果我们说出新派代表的名字，你们中国人会吓一大跳的。倒底俄国要派什么人到中

国谈判呢？原来，俄国人想让那位指挥着23艘军舰在日本海游弋的俄国海军上将前往北京，他们认为，布策坐一只兵船就使中国人害怕了。假如派海军上将和他的23艘军舰，中国人岂不吓死了。俄方的谈判代表之一的热梅尼说得更露骨，让勒索夫斯基（海军上将）去递交最后通牒的时候，一定要拿足了架式，这个架式就是“不应只限于举起拳头，而且要有准备和有决心去使用这个拳头。”

这个拳头够厉害的，至少它包括23艘战舰和这些战舰上的全部武器。

可是把中国人逼极了呢？

10月20日的谈判，内容还是这些，不过俄国的代表换上了想举起拳头的热梅尼。这个热梅尼上来就说，是中国想把战争强加到俄国人头上，是中国在西北派添防兵，是中国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曾纪泽说，中国从没有打算用兵，是你们派了那支庞大的舰队到中国沿海示威的，热梅尼无话了。可是要挟却升了级。他说，按时间算，《里瓦几亚条约》批准的期限只有11天了，假如你们还不赶快想办法，我们的海军上将就要和临时代办凯阳德一起向清政府发去最后通牒。热梅尼像演员一样，学着宣读最后通牒时那冷酷无情的样子“本政府不得不如此，别无办法……若再延迟，不如打仗合算。”热梅尼还加了一句，这是我们皇帝的最后一句话。

这是赤裸裸的战争威胁！

曾纪泽比任何时候都更冷静。他瞧着情绪激昂得有些亢奋的热梅尼平静地回答，真要是这样的话，我也有最后一句话告诉阁下，“可照贵国之意，将前约全行废弃，伊犁地方暂时仍不索取，以期两便，而固邦交。”听到这里热梅尼眼睛一亮，什么，伊犁你们不要啦？曾纪泽提高了声音说中国人没有人敢说不要伊犁，只是“中国将来再索伊犁，如仍系两国友睦和平商议之时，中国以礼来索，贵国亦以礼相答；倘两国不幸有失和之事，中国以兵威来索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乎！”

这回热梅尼听明白了，他呆在那里半晌无话。

沙俄以战争相威胁没有奏效，倒是把中国人逼到了也以战争相回答的绝境上。格尔斯意识到，“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不错，他们不愿打仗，而且害怕打仗。但是他们确知我们并不比他们更愿打仗，并且也没有能力打仗。”俄国人对自己的实力再清楚不过了，俄土战争才结束不久，国库早已空空如也。海军方面发动进攻是有可能，但是无财力支持也无能为力；从陆路打到北京更是天方夜谭。

真没想到，逼中国人的结果反而把自己逼到绝境上。

后来俄国人不提用相应的土地换特克斯河流域了。他们把补偿的要求转移到别的方面。另外，

在塔尔巴哈台以及喀什噶尔的界务上，俄国人寸步不让，在这方面曾纪泽让步了。

较量成功了。俄国人妥协了。

改约的第二个难题是赔款问题。

赔款也是俄国人关心的重要问题，因为从1878年俄土战争以后，俄国财政赤字一直居高不下，到1881年，赤字竟达到5 000万卢布。此刻俄国财政拮据，正想从中国搞一些钱。

对赔款问题，中俄双方的想法也有很大差距。从中国来说，一开始就准备要让步，只要争回特克斯河，在赔款方面是可以多出一点钱的。但是，中国人根本没想到要赔一亿卢布之巨。

10月20日，也就是热梅尼以战争威胁中国的那一天，他谈到赔款的问题时，曾给曾纪泽算了一笔账：由于中国方面拒绝《里瓦几亚条约》，所以俄国不得不设防添兵，并派舰队去中国，为这几项支出，俄国已经花掉了1 200万卢布……，假如你们还把谈判往后拖，那就会花到2 400万，甚至更多，这笔钱迟早要算到你们的账上。曾纪泽当时觉得这种漫无边际的要价只不过是对特克斯河的归属问题施加压力。没想到11月8日，热梅尼为赔款问题专门写了一份正式照会，并把赔偿俄方兵费列到里面了。曾纪泽觉得实在好笑，他质问热梅尼说，是你们屯兵边界，是你们派军舰去日本海要挟中国，倒要我们出钱，天下岂有这等荒唐的事？热梅尼无理搅三分，还振振有词地

回答说，"此系中国赔补俄国备兵设防之款。……盖中国既不批准前约，又不向本国和平商议，遽然调兵制械，一切举动显示与本国不睦之意，逼得本国亦动用巨款，备兵设防……，本国既因中国所逼，以致费此巨饷，理应向中国索偿，方昭平允。"曾纪泽马上严肃起来，义正辞严地说，"向来打仗之后，始可索要兵费，今中国既不知贵国派有兵船，又愿同贵国和平商议，岂有向中国索要兵费之理？"你们说你们一向是抱着友善的态度与中国交往，可是你们却派了兵船去中国家门口，难道这也是友善之举吗？兵费一项实属名不正言不顺。如果开了这个先例，将来所有的国家出现了空亏，都向我们国家要钱，能行吗！热梅尼无理可说，竟像一个恶棍耍起赖来，"本国不管别国之事，"只要你们给钱补我们的亏空！

当天，热梅尼给格尔斯写信汇报情况，他告诉格尔斯，可以不拘什么形式，尽可能从中国搞来更多的钱。所以要重实不重名。格尔斯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为了这个名与实的问题，俄国各界有不同的看法。考夫曼认为以代收代管伊犁费为名最为合适，而且提出至少一亿元赔款才行。亚历山大皇帝特别欣赏这个说法。陆军大臣米留金说名不名无所谓，关键是拿钱来。他想的是如果俄土关系再度紧张起来，拿什么钱支持下一场俄土战争。外交官布策最重视名的问题，他认为不能用增加伊犁占领费的名义，一定要坚持赔偿军

费这个名义，只有这样才可以取得“道义上的满足”。不然的话，中国人就抓住了把柄，把我们说成是一帮“穷鬼和贪钱之徒”。

为了逼中国人给钱，热梅尼说，“我们应仅限于得到事实上最可能多的东西，而不在于坚持原则。至于数目，它从属于我们施加压力的程度。假若我们总数达到1000万，我想这将是个极限，而且还得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才成。”

这简直是一伙明火打劫的强盗。

10月17日，曾纪泽表示“若稍加伊犁守费，我可应允；若言兵费，断不能允”。为钱争红了眼的热梅尼当即表示“无论兵费不兵费，总算是鄂（俄）国要钱。”不需要再正名了，而是要讨论具体数目了。双方一直争执一个多月，最后终于定了个最高数额，在原有《里瓦几亚条约》500万的基础上再加400万卢布，总数为900万卢布。

这个数和格尔斯想的1 000万卢布只差100万，还算“差强俄意。”

谈判的第三个焦点是通商。

俄国人认为，领土让步了，赔款的名分和数额也让步了，剩下的通商可绝不能再让了。况且，中俄两国边界绵延万里，通商就是通好，就是联络邦交，所以中国必须“格外从优”才行。于是他们要价比《里瓦几亚条约》还高。12月14日布策告诉曾纪泽，因为俄商在通州方面没有坚固的房子存货，所以中国应该允许俄国人在这里自盖

或租赁房屋。还说应让俄国人在天津到通州的运河里用小火轮运货。曾纪泽说这些要求连《里瓦几亚条约》里都没有，怎好再增加呢？讨论的范围是不可以逾越《里瓦几亚条约》范围的。

双方争来争去，曾纪泽争回了不许俄国开辟经西安、汉中到汉口的商路。其它基本上维持了《里瓦几亚条约》有关商务的规定。当俄国人还想尽力扩大他们的侵略权益的时候，从中国传来了一个微妙的讯息，左宗棠奉旨由哈密秘密启程进京了。这个消息引起俄国人极大的不安。他们以为再纠缠下去，中国人会被逼得动起武来。格尔斯、布策私下里察颜观色，想从曾纪泽那里得到点消息，可是曾纪泽照旧平静地出奇，这越发使人猜疑了。沙皇赶紧下命令"务须及早定议，免生枝节。"

历时4个月的谈判，终于有了眉目。

11 危机并没有过去

曾纪泽的使命完成了。新疆将近20年的动荡结束了。伊犁回归了。

1881年（光绪七年）2月24日，《改订条约》签字。因为它是专门交还伊犁的条约，所以又叫《中俄伊犁条约》，又因为它是在俄国彼得堡订立的，所以又叫《圣彼得堡条约》。中国代表曾纪泽和俄国代表格尔斯、布策分别代表本国在中文、俄文、法文3种文本上签了字。同《改订条约》一起签字的还有《伊犁专条》、《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和《俄商前往中国贸易过界卡伦单》。

《改订条约》共20条，主要内容是：

1. 割地赔款。条约规定，中俄两国边界顺霍尔果斯河至河口，过伊犁河往南，原属中国的"伊犁西边地方应归俄国管属"。至此俄国割走霍尔果斯河以西1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条约还规定勘改斋桑泊以东中俄旧界，这样斋桑湖越来越远离中国了。条约还规定偿付俄国"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及其它补偿费900万卢布。相当

于中国白银 509 万两。2 年偿清。

2. 通商。条约重申俄商在中国蒙古地区享有免税特权，在新疆南北两路贸易也“暂不纳税”。准许俄国商人有权在设有俄国领事馆的城市及张家口建造铺房行栈。大体上与《里瓦几亚条约》一样。

3. 增设领事。允许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肃州（嘉峪关）、吐鲁番增设领事馆。(其中很多是以前已设之地)，还预先答应将来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五处商务兴旺以后也可以添设领事。同时，这些领事获得了与中国地方官“共同查办”两国人民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一切事端。

4. 允许伊犁居民“自愿”迁居俄国。条约规定如果伊犁居民愿意迁居俄国、加入俄籍，中国政府“不得对他们迁出和携带动产予以任何阻拦。”自从沙俄侵占伊犁以来，已经裹胁走成千上万的中国居民。条约订立之后逼迁中国民人更“名正言顺”。据不完全统计《改订条约》签字以后，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自愿”迁入俄国的中国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居民共达 70 000 多人。等中国政府接收伊犁时，该地居民仅剩 67 800 多人了。而且伊犁地区差不多所有的农民全都迁入俄境，使这里的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打击。

那么，与《里瓦几亚条约》相比曾纪泽争回了什么呢？

以领土而论，由于特克斯河流域回归，中国有2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免遭割让。

以商务而论，原订的新添七处领事点改成了2处；删除了由嘉峪关至汉口的陆路商道和俄轮可由松花江直达伯都讷的水路商道。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做到这一点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西北边疆的危机因为《改订条约》的签订而最后解决。伊犁失而复得，全疆乱而复平，上上下下的官员包括皇帝太后在内全都受到了鼓舞。人们在这一点上至少可以扬眉吐气了。不几年之后，新疆改建行省，那位在收复新疆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刘锦棠当上了第一任新疆巡抚，从此西北与中原内陆的关系更为紧密了。

中国对《改订条约》基本是满意的。因为比起《里瓦几亚条约》来，它收回了不少差点丢掉的权益。特别是它是在困难的条件下，第一次从一个欧洲强国那里争回了权益的条约。这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俄国对《改订条约》也是满意的，因为他们早就弄明白了，要想诈取更多的东西是做不到的。热梅尼看出了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只有要正视事态，接受现状，因为“对于这些中国老爷们，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十分傲慢，并且熟悉国际政治，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正如科托尔的示威没有使苏丹害怕一样。不错，他们不愿

打仗，而且害怕打仗。但是他们确知我们并不比他们更愿打仗，并且也没有能力打仗。他们肯定知道，列索夫斯基（又译勒索夫斯基）必须尊重国际贸易，不可能用他的舰队做出什么严重的事情。而在陆路方面我们又无法向北京进军！即使他们自己看不出这些，在这里也一定有好朋友开导他们。”“虽然俄国名义上放弃了对一部分中国领土的要求，但不能说它在这项交易中吃了亏。”

签约的第二天，曾纪泽就整理好行装，向各国驻彼得堡公使，向格尔斯，热梅尼等人辞行。第三天，离开彼得堡回巴黎。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次交涉完成了。中国西北边疆最棘手，最复杂，历时最长的一次谈判了结了。

曾纪泽还在彼得堡谈判的时候，曾经骄傲地宣称：“我想自今以后，中国土地，断无再让之事”！人们多希望曾纪泽所想，曾纪泽所言全都实现！多希望边疆危机不再重演！多希望来自西北，来自东南，来自西南不再是告急的声音，而是御敌的凯歌！多希望从此中国走上改革之路，走上富强之路，走上强国之路！

可惜，危机并没有真正过去，仅仅三年之后，西南危机，中法之战起；13 年之后东北、东南告急，中日之战起；17 年后瓜分狂潮掀起排天的浊浪；19 年后北部中国危亡在即！

触目惊心，惊心触目！

多灾多难的祖国，多灾多难的人民！

附录1 主要引用书目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6卷，第68卷。

《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卷。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册。

北大历史系：《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下册。

沙皇俄国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沙皇俄国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9卷，10卷，15卷，17卷，22卷，28卷，89卷。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社会科学院：《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卷，15卷，16卷，17卷，18卷，22卷。

《李文忠公奏稿》第24卷。

《左文襄公奏稿》第46卷。

《左文襄公书牍》第13卷，17卷。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第7卷。

商务印书馆翻译组：《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出版社 1985 年版。

附录2 勘分西北界约记

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同治三年九月七日，俄历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塔尔巴哈台。

大清国钦差勘办西北界事宜大臣定边左副将军镶红旗汉军都统明宜，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副都统锡霖，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副都统衔诺奇泰巴图鲁博勒果索；

大俄罗斯国钦差分界全权大臣住扎伊犁格讷喇勒匪苏勒大臣斯塔特斯奇索斐业特呢克喀瓦里业尔依旺杂哈劳，分界全权大臣悉毕尔兵队大臣格讷喇勒呢什塔布之坡勒科倭呢克喀瓦里业尔依旺巴普考；

各承君命，遵照京城议定和约，以敦两国和好，在塔尔巴哈台会同，将自沙滨达巴哈起至浩罕边界之葱岭止两国中间应分界址，顺山岭、大河及现在中国常住卡伦，议定交界，绘画地图，图内以红色线道分为两国交界，今将议定界址地名并拟议章程，开例于后：

第一条　自沙滨达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后往南，顺萨彦山岭，至塘努鄂拉达巴哈西边末处，转往西南，顺赛留格木山岭，至奎屯鄂拉，即往西行，顺大阿台山岭；至齐桑淖尔北面之海留图两河中间之山，转往西南，顺此山直至齐桑淖尔北边之察奇勒莫斯鄂拉；即转往东南，沿淖尔，顺喀喇额尔齐斯河岸，至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为界。此

间分别两国交界，即以水流为凭：向东、向南水流之处，为中国地；向西、向北水流之处，为俄国地。

第二条　自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起，往东南行，至赛里鄂拉；先往西南，顺库木尔齐、哈喇布拉克、巴克图、苇塘子、玛呢图、沙喇布拉克、察汗托霍依、额尔格图、巴尔鲁克、莫多巴尔鲁克等处卡伦之路；至巴尔鲁克、阿拉套两山岭中间，由平地行，即在哈布塔盖、阿噜沁达兰两卡伦中间，择山坡定界，自此至阿勒坦特布什山岭东边末处为界。此间分别两国交界，即以水流为凭：向东、向南水流之处，为中国地；向西、向北水流之处，为俄国地。

第三条　自阿勒坦特布什山岭东边末处起，依阿拉套大岭往西，顺阿勒坦特布什、索达巴哈、库克托木、罕喀尔察盖等山顶。向北水流之处，为俄国地；向南水流之处，为中国地。至向东水流之萨尔巴克图河，向西流水之库克鄂罗木河，向南流水之奎屯河源之匡果罗鄂博山，即转往南。向西流水之库克鄂罗木等河之处，为俄国地；向东流水之萨尔巴克图等河之处，为中国地。自此奎屯河西边之奎塔斯山顶，行至图尔根河水从山内向南流出之处，即顺图尔根河，依博罗胡吉尔、奎屯、齐齐干、霍尔果斯等处卡伦，至伊犁河之齐钦卡伦。过伊犁河，往西南行，至春济卡伦，转往东南，至特穆尔里克河源。转东，由特穆尔里克（即南山也）山顶行，围绕哈萨克、布鲁特游牧之地，至格根河源，即往西南。格根等向西流水之处，为俄国地；温都布拉克等向东流水之处，为中国地。自此往西南，由喀喇套山顶行，至毕尔巴什山，即顺向南流水之达喇图河，至特克斯河。过特克斯河，顺那林哈勒哈河，靠天山岭为界。自此往西南，分晰回子部落、布鲁特部落住牧之处，由特穆尔图淖尔南边之罕腾格尔、萨瓦巴齐、贡古鲁克、喀克善等山，统曰天山之顶，行至葱岭，靠浩罕界为界。

第四条　现将边界顺山岭、大河及常住卡伦议定后，

其边界以外分入俄国之地，原有中国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所属大阿勒台等山岭迤北旧住之乌克克等卡伦，塔尔巴哈台所属塔尔巴哈台山岭迤北旧住之鄂伦布拉克等卡伦，及阿拉套山迤北旧住之胡苏图阿鲁沁达兰卡伦，伊犁所属旧住之匡果罗鄂伦等卡伦，建立界牌鄂博以前，仍听中国在彼住守，统俟明年两国立界大臣会同建立界牌鄂博时，何处将界牌鄂博立毕，即将何处应向内挪移卡伦，限一月内挪移。

第五条　今将边界议定，永固两国和好，以免日后两国为现定边界附近地方住牧人丁相争之处，即以此次换约文到之日为准，该人丁向在何处住牧者，仍应留于何处住牧，俾伊等安居故土，各守旧业。所以地面分在何国，其人丁即随地归为何国管辖；嗣后倘有原住地方越往他处者，即行拨回，免致混乱。

第六条　自现在议定边界换约之日起，过二百四十日，即为两国立界大臣订准日期，俄国两起立界大臣均赴阿噜沁达兰、喀布塔盖两卡中间会齐：一起会同伊犁立界大臣往西南，按照议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一起会同塔尔巴哈台立界大臣往东北，按照议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会同科布多立界大臣，按照议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索果克卡伦，会同乌里雅苏台立界大臣，按照议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至沙滨达巴哈止。如遇大山，以山梁划界；遇大河，以河岸划界；如遇横山、横河，俱以新立界牌鄂博划界。至建立界牌鄂博时，总以各界址处所水流之方向作为立界之凭，择其地方形势建立。如有大岭，行人不能越往、实难堆立之处，即以水流及山岭为界。其平旷之区，两国堆立界牌鄂博时，中间空出二十丈，作为公中之地。所立界牌鄂博以左，其山河所产一切物件，均属中国；所立界牌鄂博以右，其山河所产一切物件，均属俄罗斯国。

第七条　明年两国立界大臣建立界牌鄂博毕，再将堆立界牌鄂博共若干处，及均在何处堆立地名，作记互换为凭。

第八条　今将两国应分界址议定。建立界牌鄂博后，倘有河源系在中国而流注于俄国者，中国不得改截其流注之故道；倘有河源系在俄国而流注于中国者，俄国亦不得改截其流注之故道。

第九条　从前仅止库伦办事大臣与恰克图固毕尔那托尔，及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与西悉毕尔总督往来行文；自今勘定边界之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遇有会同俄国查办事件，应似增添由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与托木、色米珀拉特二省固毕尔那托尔往来行文办理。其所行文件，或用清字，或用蒙古字俱可。

第十条　塔尔巴哈台所属巴克图卡伦迤西小水地方，旧有种地纳粮民庄五处。该处地面，按今议定界址，虽已分在俄国，惟该民人所种田地断难遽令迁移，应于立界后，限十年内，令伊等陆续内迁。

今经两国大臣会同议定，将一切分定界址绘图四份，图内分定界址，地名用俄罗斯字、满洲字合璧注写，两国勘界大臣钤印画押。并作此记约，用俄罗斯字、满洲字各书写四分，两国勘界大臣钤印画押，一并互换。两国分界大臣各存图志一分，记约各一分，以便查办外，其余图志二分，合璧记约二分，由两国分界大臣自行呈送各本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一分，以备补续京城议定条约，为此互换记约。

录自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15——218页。

附录3 伊犁条约

一八七九年十月二日，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俄历一八七九年九月二十日，利注底。

第一条 大俄国大皇帝允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即同治十年，俄兵代收伊犁地方，交还大清国管属。此约第七条所载伊犁西边及帖克斯川一带地方，应归俄国管属。

第二条 大清国大皇帝允将伊犁扰乱时及平靖后该处居民所为不是，无分民教，均免究治，免追财产。中国官员于交收伊犁以前，遵照大清国大皇帝恩旨，出示晓谕伊犁居民。

第三条 伊犁居民或愿仍居原处，或愿迁居俄国入俄国籍者，均听其便，应于交收伊犁以前询明。其愿迁居俄国者，自交还伊犁之日起，与一年限期，迁居携带财物，中国官并不拦阻。其已入俄国籍之人，将来至中国地方贸易、游历等事，凡有两国条约许与俄民利益之处，亦准一体均沾。

第四条 交收伊犁后，俄国人在伊犁地方置有产业者，应准照旧章管业。

第五条 两国特派大臣一面交换伊犁，一面接收伊犁，并遵约内关系交收各事宜，在伊犁城会齐办理施行。该大臣遵照督办交收伊犁之陕甘总督，图尔克斯唐总督商定

次序开办。陕甘总督奉到中国御笔批准条约，将通行之事派委妥员前往塔什干城，知照图尔克斯唐总督，自该员到塔什干城之日起，于两月内应将交还伊犁之事办竣。会办交收各事，宜无可议。

第六条　大清国大皇帝允将大俄国自同治十年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并将补恤在中国境内被抢受亏俄商及被害俄民家属之款共银卢布五百万元，归还俄国。自换约之日起，按两国所定次序，一年归完。

第七条　中国接收伊犁地方后，其伊犁西边及帖克斯川一带地方归俄国管属，以便入俄国籍之民在彼安置。今将两国交界，明定如左：

两国交界，自别珍岛山，顺霍尔果斯河，至该河入伊犁河汇流处，再过伊犁河往南，至乌宗岛山廓里扎特村东边，顺阿支不尔塔什山岭上，即帖克斯川北分流之处往东，其哈拉凯及察普察勒等山口，归俄国属。过帖克斯河，仍顺阿克不尔塔什山岭，至廓克苏打湾山口，自此往南，至艾什克巴什山，再往西南，顺天山之哈雷克岛、罕颠葛里、萨雷雅萨、库库尔特留克、廓克山、喀拉帖凯等山，至苏约克山口。

从前浩罕地方，即今俄国属之费原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等处地方交界，明定如左：

由苏约克山顶（此山口应归俄国属）往南，顺有阿来廓勒及萨乌业尔得二山口之山脚，至业精与那格拉察勒得二卡中间之地，由此往伊尔克什唐卡东之齐吉勒苏河，再往南，至玛里他巴尔山。

第八条　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即同治三年，塔城界约第一、第二两条所定交界，有不合宜，拟将此界，改定如左：

两国交界，自奎峒山顺喀巴、布尔崇二河中间山岭分流之处，过黑伊尔特什河，至萨乌尔岭内堪迭尔雷克河源，

此条及前条所定各界，在此约所附图上，用朱笔作线，注以俄国字母。

第九条　以上第七、第八两条所定两国交界地方及从前未立界牌之交界各处，应由两国派大员勘定、安设界牌。所有应行分界立牌之处分定几段，分行派员勘定，安设界牌。各大员等会齐地方、时日，应由两国酌核定拟。

第十条　俄国照旧约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官外，准在嘉峪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设立领事官，其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四城，共准设领事官二员，其嘉峪关领事兼管甘肃、陕西通商事务。照依一千八百六十年，即中国咸丰十年，北京和约第五、第六两条，应给予所盖房屋、牧放牲畜、设立坟茔等地，以上应设领事官各处，亦准一律照办。领事官公署未经起盖之先，地方官帮同租赁暂住房屋。俄国领事官在蒙古地方及天山南北两路往来行路、寄发信函，比照天津和约第十一、北京和约第十二两条，可由台站行走，地方官妥为照料。

第十一条　俄国领事官驻中国，遇有公事，分别情行，或与本城地方官，或与地方大宪往来，均用信函，画押盖印；彼此往来会晤，均以友邦官员之礼相待。两国人民在中国地方贸易等事，致生事端，应由领事官与地方官公同查办。如因贸易事务致起争端，听其自行择人从中调处，如不能调处完结，再由两国官员会同查办。两国人民为预定货物、运载货物、租赁铺房等事所立字据，可以呈报领事官及地方官处画押盖印为凭。遇有不按字据办理之人，领事官及地方官令其照依字据办理。

第十二条　俄国人民准许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并不纳税；其蒙古各处及各盟设官与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亦不纳税；并准俄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关外之天山南北两路各城地方贸易，均不纳税。以

上所载中国各处，准许俄民出入，贩运各国货物；其卖买货物或以钱易货，或以货换货俱可，并准以各种货物抵账。

第十三条　俄国应设领事官处及张家口，准俄民建造铺房行栈，或在自置地方，或照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即咸丰元年，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第十三条办法，由地方官给地盖房亦可。

第十四条　俄商自俄国由陆路贩货入中国内地，准许经过张家口、嘉峪关前赴天津、汉口，并准在张家口、嘉峪关、通州、西安府、汉中府各等处销售，或由各处运往内地销售俱可。俄商在以上各城、各口及内地贩买货物，亦准由此路经过张家口、嘉峪关运往俄国。

第十五条　俄国人民在中国内地及关外地方陆路通商，应照此约所附章程办理。其约内通商各条及通商章程，自奉到御笔批准换约之日起，于五年后会议酌改，如五年限满，前六个月内未经知照酌改，应仍照行五年。俄国人民在中国沿海通商，准照各国总例一律办理。如将来总例有应修改之处，应由两国会议酌改。

第十六条　将来俄国陆路通商较旺，出入中国货物，如要定立税则较为合宜，应由中、俄两国会议定立，进口、出口货物，均按值百抽五纳税。惟未定税则之前，先将现照上等茶纳税之各种下等茶之税酌减定拟，应由中国总理衙门会同俄国驻北京全权大臣，自批准换约后，一年内会商酌定。

第十七条　一千八百六十年，即咸丰十年，北京所定和约第十条，至今讲解各异，拟将此条声明追还牲畜之条，其意应作为：凡有牲畜被人偷盗、诱取，一经获犯，应将牲畜追还，如无原物，作为向该犯追偿；倘该犯无力赔还，地方官不能代赔。两国边界官应各按本国之例将盗取牲畜之犯，严行究治，并设法将自行越界及偷盗之牲畜追还，其自行越界及偷盗之牲畜踪迹示知边界兵并附近乡长。

第十八条　此约两国御笔批准后，各将条约通行晓谕各处地方遵照。将来换约应在彼得堡，以一年为限，能于期内互换亦可。两国全权大臣将此议定，备汉文、俄文、法文各两份，画押盖印为凭，三国文字校对无讹，遇有讲论，以法文为证。

录自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60——364页。

附录4 改订条约

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俄历一八八一年二月十二日，圣彼得堡。

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愿将两国边界及通商等事于两国有益者，商定妥协，以固和好，是以特派全权大臣会同商定：

大清国钦差出使俄国全权大臣一等毅勇候大理寺少卿曾；

大俄国钦差参政大臣署理总管外部大臣萨那尔特部堂格、参议大臣出使中国全权大臣布；

两国全权大臣各将所奉全权谕旨互相校阅后，议定条约如左：

第一条　大俄国大皇帝允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即同治十年，俄兵代收伊犁地方，交还大清国管属。其伊犁西边，按照第七条所定界址，应归俄国管属。

第二条　大清国大皇帝允降谕旨，将伊犁扰乱时及平靖后该处居民所为不是，无分民、教，均免究治，免追财产。中国官员于交收伊犁以前，遵照大清国大皇帝恩旨，出示晓谕伊犁居民。

第三条　伊犁居民或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国籍者，均听其便。应于交收伊犁以前询明，其

愿迁居俄国者，自交收伊犁之日起，予一年限期；迁居携带财物，中国官并不拦阻。

第四条　俄国人在伊犁地方置有田地者，交收伊犁后，仍准照旧管业。其伊犁居民交收伊犁之时入俄国籍者，不得援此条之例。俄国人田地在咸丰元年伊犁通商章程第十三条所定贸易圈以外者，应照中国民人一体完纳税饷。

第五条　两国特派大臣一面交还伊犁，一面接收伊犁，并遵照约内关系交收各事宜，在伊犁城会齐办理施行。该大臣遵照督办交收伊犁事宜之陕甘总督与土尔吉斯坦总督商定次序开办，陕甘总督奉到大清国大皇帝批准条约，将通行之事派委妥员前往塔什干城知照土尔吉斯坦总督。自该员到塔什干城之日起，于三个月内，应将交收伊犁之事办竣，能于先期办竣亦可。

第六条　大清国大皇帝允将大俄国自同治十年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并所有前此在中国境内被抢受亏俄商及被害俄民家属各案补恤之款，共银卢布九百万圆，归还俄国。自换约之日起，按照此约所附专条内载办法次序，二年归完。

第七条　伊犁西边地方应归俄国管属，以便因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在彼安置。中国伊犁地方与俄国地方交界，自别珍岛山，顺霍尔果斯河，至该河入伊犁河汇流处，再过伊犁河，往南至乌宗岛山廓里扎特村东边。自此处往南，顺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旧界。

第八条　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齐桑湖迤东之界，查有不妥之处，应由两国特派大臣会同勘改，以归妥协，并将两国所属之哈萨克分别清楚。至分界办法，应自奎峒山过黑伊尔特什河至萨乌尔岭画一直线，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线与旧界之间，酌定新界。

第九条　以上第七、第八两条所定两国交界地方及从前未立界牌之交界各处，应由两国特派大员安设界牌，该

大员等会齐地方、时日，由两国商议酌定。

俄国所属之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西边交界地方，亦由两国特派大员前往查勘，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牌。

第十条　俄国照旧约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官外，亦准在肃州（即嘉峪关）及吐鲁番所设领事官，于附近各处地方关系俄民事件，均有前往办理之责。按照一千八百六十年，即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第五、第六两条应给予可盖房屋、牧放牲畜、设立坟茔等地，嘉峪关及吐鲁番亦一律照办。领事官公署未经起盖之先，地方官帮同租觅暂住房屋。俄国领事官在蒙古地方及天山南北两路往来行路、寄发信函，按照天津条约第十一条、北京条约第十二条，可由台站行走。俄国领事官以此事相托，中国官即妥为照料。吐鲁番非通商口岸而设立领事，各海口及十八省、东三省内地，不得援以为例。

第十一条　俄国领事官驻中国，遇有公事，按事体之关系、案件之紧要及应如何作速办理之处，或与本城地方官，或与地方大宪往来，均用公文。彼此往来会晤，均以友邦官员之礼相待。两国人民在中国贸易等事，致生事端，应由领事官与地方官会同查办。如因贸易事务致启争端，听其自行择人从中调处，如不能调处完结，再由两国官员会同查办。两国人民为预定货物、运载货物、租赁铺房等事所立字据，可以呈报领事官及地方官处，应与画押盖印为凭。遇有不按字据办理情事，领事官及地方官设法务令照依字据办理。

第十二条　俄国人民准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照旧不纳税，其蒙古各处及各盟设官与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亦照旧不纳税。并准俄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关外之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由两国议定税则，即将免税之例废弃。以上

所载中国各处准俄民出入贩运各国货物，其买卖货物或用现钱，或以货相易俱可，并准俄民以各种货物抵帐。

第十三条　俄国应设领事官各处及张家口，准俄民建造铺房、行栈，或在自置地方，或照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即咸丰元年，所定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第十三条办法，由地方官给地盖房亦可。张家口无领事而准俄民建造铺房、行栈，他处内地不得援以为例。

第十四条　俄商自俄国贩货，由陆路运入中国内地者，可照旧经过张家口、通州前赴天津，或由天津运往别口及中国内地，并准在以上各处销售。俄商在以上各城、各口及内地置买货物，运送回国者，亦由此路行走。并准俄商前往肃州（即嘉峪关）贸易，货帮至关而止，应得利益照天津一律办理。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在中国内地及关外地方陆路通商，应照此约所附章程办理。此约所载通商各条及所附陆路通商章程，自换约之日起，于十年后，可以商议酌改；如十年限满前六个月未请商改，应仍照行十年。俄国人民在中国沿海通商，应照各国总例办理。如将来总例有应修改之处，由两国商议酌定。

第十六条　将来俄国陆路通商兴旺，如出入中国货物必须另定税则，较现在税则更为合宜者，应由两国商定，凡进口、出口之税均按值百抽五之例定拟。于未定税则以前，应将现照上等茶纳税之各种下等茶出口之税，先行分别酌减。至各种茶税，应由中国总理衙门会同俄国驻京大臣，自换约后一年内会商酌定。

第十七条　一千八百六十年，即咸丰十年，在北京所定条约第十条至今讲解各异，应将此条声明，其所载追还牲畜之意，作为凡有牲畜被人偷盗、诱取，一经获犯，应将牲畜追还，如无原物，作价向该犯追偿。倘该犯无力赔还，地方官不能代赔。两国边界官应各按本国之例，将盗

取牲畜之犯严行究治，并设法将自行越界及盗取之牲畜追还。其自行越界及被盗之牲畜踪迹，可以示知边界兵并附近乡长。

第十八条　按照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即咸丰八年，在瑷珲所定条约，应准两国人民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行船并与沿江一带地方居民贸易，现在复为声明。至如何照办之处，应由两国再行商定。

第十九条　两国从前所定条约未经此约更改之款，应仍旧照行。

第二十条　此约奉两国御笔批准后，各将条约通行晓谕各处地方遵照。将来换约应在森彼得堡，自画押之日起以六个月为期。

两国全权大臣议定，此约备汉文、俄文、法文约本两分，画押盖印为凭，三国文字校对无讹，遇有讲论以法文为证。

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二月十二日

订于森彼得堡都城

专　　条

按照中、俄两国全权大臣现在所定条约第六条所载，中国将俄兵代收、代守伊犁兵费及俄民各案补恤之款，共银卢布九百万圆，归还俄国，自换约之日起，二年归完，两国全权大臣议将此款交纳次序办法商定如左：

以上银卢布九百万圆，合英金磅一百四十三万一千六百六十四圆零二希令，匀作六次，除兑至伦敦汇费毋庸由中国付给外，按每次中国净交英金磅二十三万八千六百一十圆零十三希令八本七，付与伦敦城内布拉得别林格银号收领，作为每四个月交纳一次，第一次自换约后四个月交

纳，末一次在换约后二年期满交纳。此专条应与载明现在所定条约无异，是以两国全权大臣划押、盖印为凭。

附　　注

本条约及专条均见“光绪条约”，卷 5，页 15--21，30。俄文本及法文本见“俄外部：俄华条约集”，页 225—237。

本条约于一八八一年八月十九日在圣彼得堡交换批准。

录自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381——385 页。